

THE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5061/5600.1

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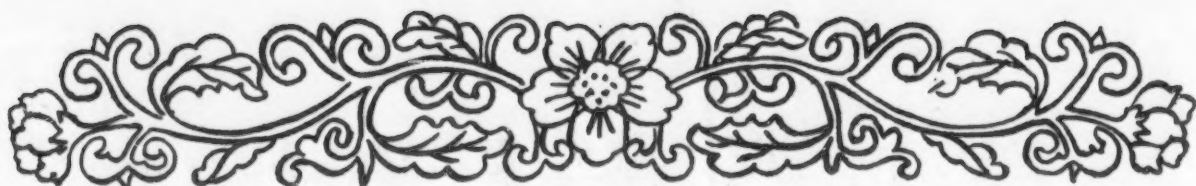
JUL 28 1959

中國語文



42

1955.12



中國語文 1955年12月号(总第42期)目录

| | |
|-----------------------------|-------------|
| 現代漢語規範問題····· | 罗常培、吕叔湘 (3) |
| 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为標準音的普通話····· | 張奚若 (9) |
| 曲艺工作者應該怎样進行推廣語言規範的工作····· | 吳曉鈴 (14) |
| 教學北京音的点滴經驗····· | 徐世榮 (16) |
| 漢語規範化对兄弟民族學習漢語的重要意義····· | 吳昌 (21) |
| 電影、話劇演員們要担起漢語規範化工作中的重任····· | 吳青 (22) |
| 翻譯工作中的漢語規範化問題····· | 董秋斯 (26) |
| 关于詞典的选詞工作····· | 孫崇义 (28) |
| 近几年來苏联东方學研究中的漢語形态問題····· | 郭路特 (30) |
| 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決議····· | (24) |

報道·消息

| | |
|---|------------|
| 民族語文科學討論会在北京勝利召開····· | 本刊編輯部 (27) |
| 《語文學習》和本刊聯合招待各地語文工作者舉行座談····· | 本刊編輯部 (29) |
| 在語言科學的研究中體現了深厚的兄弟般的友誼(記兄弟國家 語言學者最近在我國的學術活動)····· | 何立 (35) |
| ·对漢字改革和漢語規範化的反映(讀者來件綜述)····· | 本刊編輯部 (39) |
| 教育部發佈推行簡化漢字的通知和推廣普通話的指示····· | 本刊編輯部 (41) |

語文書刊評介

| | |
|--------------------------|--------------|
| 許王了一《中國語法綱要》····· | 苏联 雅洪托夫 (42) |
| 《中國語文叢書》簡介····· | 本刊編輯部 (45) |
| 《中國語文》第37期到第42期篇目索引····· | (46) |

本刊啓事

本社自即日起遷移至北京(18)翠花胡同內太平胡同8号,讀者及各方
联系請寄新址。

中國語文雜誌社

1955,12,16.

現代漢語規範問題

——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的報告提綱——

羅常培 呂叔湘

這個報告分三個部分，談三個問題：（1）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提出現代漢語的規範問題？（2）關於現代漢語的規範化有些什麼原則性的問題需要解決？（3）怎樣進行規範化的工作？這裏所說的“現代漢語”不是泛指任何形式的漢語，而是指作為民族共同語、作為文學語言的漢語。語言的“規範”指的是某一語言在語音、詞彙、語法各方面的標準。語言是人們用來交流思想的工具，必須有一個共同的標準，才能使人們正確地互相了解。

為什麼要在現在這個時候提出漢語規範問題來討論？因為在我們祖國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現階段，這個問題有突出的重要性。語言是“使人們相互了解並使人們在其一切活動範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這一切活動範圍包括生產的領域，也包括經濟關係的領域，包括政治的領域，也包括文化的領域，包括社會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①。所以，語言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社會的發展要求語言的發展能同它相適應。但是漢語的發展已經不能同我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相適應。一百多年來的政治、經濟的發展，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使中國整個地改變了面貌。中國人民站了起來，掌握了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呈現了空前的團結。我們勝利地進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恢復國民經濟等大規模的鬥爭，並且制定了五年計劃，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正在飛躍地前進。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所需要的作為交流思想的工具，作為使我們在一切活動範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語言是什麼樣的一種語言呢？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高度發展的語言，我們所需要的是個統一的、普及的、無論在它的書面形式或是口頭形式上都有明確的規範的漢民族共同語。

只有這樣的一種民族共同語才能夠勝利地擔當團結人民，發展文化，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重要任務。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在堅決地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時代，廣大羣眾越來越多地積極參加公共生活。公開的言辭，無論是通過出版物或是出於口頭，它的意義和作用都大大地提高和擴大了，因而語言問題也就獲得了全民的重要性。科學的發展，文學的繁榮，文化、教育設施的有效利用，政治、社會生活的順利進行，無一不與語言的使用有關。爭取民族語言的高度發展是民族意識增長，民族文化高漲的自然而直接的表現。

在漢語近幾百年的發展中，已經逐漸形成一種民族共同語，這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的“普通話”。這種“普通話”最近幾十年來得到廣泛的傳播。作為民族共同語的加工形式的文學語言——“白話”，有比“普通話”更長的歷史，已經產生了並且正在產生着許多光輝的作品。但是，拿我們現在對於民族共同語的要求來衡量，則還是有所不足。這個不足，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民族共同語還不普及，還有很多人不會說普通話，只會說方言；其次，文學語言的規範還不是十分明確，十分精密。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35頁。

漢語方言還沒有經過全面的調查。根據現在知道的情況，可以分成八個大方言，每個大方言內部包括許多小方言。北方話使用的人口最多，約佔使用漢語的全部人口 70% 以上。

雖然漢語方言的差別主要只是在語音（絕大部分有規律可尋）和一部分日用詞彙（在整個詞彙裏比重不大），但是這兩者結合起來已經足以使不同方言地區的人初次接觸時感覺或大或小的困難，必須經過一番互相適應才能彼此了解。

講到文學語言，規範不明確的情形也是相當嚴重的，特別是在詞彙方面。一個很突出的現象是同義詞的繁多，“教室，課堂”；“星期二，禮拜二”——這種例子舉不勝舉。另一問題是好些意義比較抽象的詞的用法很不確定，比如“解決”，“克服”，“掌握”，“基本上”等等，到底哪些地方能用，哪些地方不能用，大家的意見就未必一致。此外，生造詞，濫用簡稱，也都是問題。

語法方面的問題不如詞彙方面嚴重，但是也還是有些問題。比如“和、同、跟、與、及”這幾個詞的取捨和分工，就是需要解決而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解決的問題。

語音方面的規範，現在政府已經確定拿北京音做標準，這是很正確的決定，既符合歷史的發展，也不違背規範化的原理。但是北京話本身也還是有好些字音上的分歧。例如“供給”（《xɿ 41 或 《xɿ 41 ），“醞釀”（uɿ 31ɿ 或 xɿ ɔɿ ），“危險”（“危”陽或陰），“侵略”（“侵”陰或上），這種例子是很多的。有的，字典裏註音只有一個，可是很多人不是那樣說；有的，字典裏也是兼收並蓄，更是叫人無所適從。

漢語使用的人多，分佈的地區廣，方言的分歧是可以理解的。白話是在文言佔統治地位的條件下產生和發展的，在短短的幾十年裏擴展了它的应用範圍，成為全面的文學語言，規範的不夠精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前邊所已經說過的，這兩種情況都不能適應我們發展文化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是必須改變的。這兩種情況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部分。共同的語言和規範化的語言是不可分割的，沒有一定的規範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共同。

二

關於語言規範化，有幾個原則性的問題必須討論。

第一個問題是：民族共同語是怎樣形成的？民族共同語和方言的關係如何？這個問題的答案對於進行規範化的方針的決定是重要的。

民族共同語是在某一方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基礎方言的地區總是在這個民族的文化上和政治上佔重要位置的地區，基礎方言本身也常常最能代表整個語言的發展趨勢。但是無論怎樣，民族共同語不會採納基礎方言的全部內容，基礎方言裏非常特殊的東西不會被容留在民族共同語裏邊。同時，民族共同語在它的形成過程中也不斷地從其他方言裏吸取營養。逐漸，所有有活力的，為它的發展所不可缺少的東西都集中到民族共同語裏，剩下來的在民族共同語裏都已經有了同義的表達手段。方言對於民族共同語的貢獻逐漸減少，方言本身在民族共同語影響之下也將逐漸萎縮而終於消滅。但這是一個很長期的過程。民族共同語的形成並不以方言消滅為條件，這兩件事情在時間上是有先後的。

漢語很早就有書面語言，這種書面語言必然是在口語的基礎上產生的。但是在封建社會裏，書面語言只是一小部分受過教育的人的交際工具，這就很容易使它与人民口語脫節；用來書寫的漢字的特殊性質也起了一定的誘導作用。經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一種新的書面語言開始出現，這種書面語言是同口語密切聯系的。這種新的書面語言和舊的書面語言，用後世所起的名稱說就是“白話”和“文言”，雖然也互相影響，但基本上是分道揚鑣，各有应用的範圍。這“白話”就是我們現在的民族共同語的文學語言的來源，它的基礎方言是北方話。

不久，以北方話為基礎的共同口語也開始形成，就是所謂“官話”。這個名稱在明朝人的著作裏已經出現。當然，官話的擴展還是落在白話後面。很多非北方話地區的人通過文學作品學會了“看”甚至“寫”白話，但是“說”是不成的。18世紀初年，滿清政府曾經通令福建廣東兩省設立“正音書院”，教授官話，但是沒有多大成績^①。辛亥革命以後，官話的名稱被“普通話”和“國語”所代替。

民族共同語的長期的形成過程，到本世紀初年開始加速。辛亥革命以前，包括文字改革、言文一致、口語統一等多種要求的“切音”和“簡字”曾經被人提倡並試行；辛亥革命以後，由“讀音統一”而“國語統一”，也曾當作政令來推行。五四運動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初步動搖了文言的統治地位。注音字母和拉丁化新文字在北方話的推廣上起過一定的作用。但是從反動政權那裏，這種運動得到的不是幫助而是漠視或壓制。雖然在艱難困苦的情況下終於還是獲得了一些進展，但是進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成績是有限度的。

解放以後，民族共同語的要求提到了日程上來，語言學者中間展開了關於共同語標準的爭論。主張拿北京話做標準的同志們說：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說，民族共同語的形成是以一定的方言為基礎的，在所有的漢語方言裏只有北京話最有資格做民族共同語的基礎。因為北京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北京話已經在相當廣大的範圍內使用，如廣播、電影、話劇等等；北京話擁有優秀的文學作品。而且，只有一個具體的活的語言才有內部一致的規範，普通話是沒有內部一致的規範的。主張拿普通話做標準的同志們說：能說北京話的人不多，能說普通話的人卻很多，應當重視多數人的利益，不能叫多數人去遷就少數人。而且文學語言的書面形式即白話文都是用普通話寫的，連文學作品也只有少數是用純粹北京話寫的。

從民族共同語的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問題的這樣提法是不合適的。這樣的提法等於說：我們現在還沒有民族共同語，讓我們選擇一個標準來建立一個民族共同語。在這樣的提法之下，選擇“普通”話，就會在規範問題上碰壁；選擇“北京”話，就會在存在着的書面語言面前為難。從歷史發展看來，問題就應當是另外一種提法：我們已經有民族共同語，但是規範化的程度不夠，現在要使它進一步規範化，讓我們來看它過去是怎樣發展的。在這樣的提法之下，普通話和北京話就不是對立的东西，在民族共同語的歷史發展中，它們已經統一起來。從歷史上看，文學語言（白話）的方言基礎顯然比北京話大，要重新把它的語法和詞彙限制在北京話範圍之內，顯然是不可能；我們只要求它內部一致，不混亂。另一方面，普通話在語音規範方面一直是拿北京話做標準，學得不到家就成為所謂“普通”，“普通”本身不成為一種標準。“普通話”就是“通語”的意思，其中“普通”二字本來不含什麼消極的意義。我們現在應該批判那錯誤地加在“普通話”這個名稱上的不正確的涵義，使它恢復“有規範的民族共同語”的涵義。

同時，我們既然承認有確立和發展一種有規範的民族共同語的必要，對於方言的使用就不能不特別審慎。現在有些作家喜歡在作品裏大量地使用方言，這對於民族共同語規範的確立是有妨害的。

第二個問題是書面語言和口語的關係問題，也就是書面語言和口語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的問題。如果不能正確地理解這兩種語言形式之間的關係，無論是過分強調它們的共同性或是過分強調它們的特殊性，都會產生不好的結果。

在漢語的歷史上，有過長時期的言文不一致的情形。白話文運動是從言文一致的要求出發的，可是後來白話文本身又有脫離口語的傾向。20年前提倡用“大眾語”以及近年來提倡“寫話”都是為了糾正這個偏差。但是如果機械地理解“怎麼說就怎麼寫”，就會限制文學語言

①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上海，1934年，26頁。

的發展，降低它的質量。文學語言的主要形式是書面形式。它通過印刷物在文化的發展上起着極其廣大的作用，它領導整個語言，包括日常口語，向更完善的方向發展。

讓我們再看看問題的另一面。文學語言的發展，要從各方面吸取營養。毛主席教導我們，不但要學習人民羣眾的語言，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东西，還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分^①。這種古代的成分和外來的成分一般都不先通過口語而直接在書面出現的。這個情況很容易把我們領上另一條岔路。我們必須避免重犯五四以後某一時期把白話文變成“新文言”的錯誤。這就是為什麼毛主席在提出學習語言的問題的時候，首先要我們向人民羣眾學習的緣故。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規範化和個人風格的問題。有一種關於規範化的誤會，須要解釋。有人以為規範化就是把一切都規定得死死的，一樣東西只允許有一個名稱，一句話不能有兩種說法。這應該說是過慮。我們認為規範化只是把語言裏沒有用處的東西淘汰掉，一切有差別的語言形式，不論是在詞彙方面還是語法方面，不論是在基本意義方面还是在修辭色彩方面，都必須保存下來。語言規範化和文體多樣化是不矛盾的，和個人風格也是不矛盾的。再從另一方面來看，使用語言的是人，人和機器不一樣。同樣的意思，讓兩個人說出來或寫出來，詞句不會完全相同，味道不會完全一樣。這就是說，文學語言，儘管是有一定規範一定標準的語言，它的天地是寬大的，是可以讓每一個人發展他的個性的。

第四個問題是規範化和語言發展的問題，也就是對於傳統的規範和新起的變動之間的競爭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一個詞的語音變了，一個詞的意義擴大或縮小了，一個新的語法格式在排擠舊的語法格式了，這類事情是經常在發生的。中國過去崇尚傳統，講究“無一字無來歷”，這當然是不對的。現在有相反的趨勢，幾乎無選擇地歡迎一切新的，輕易地給予它們文學語言的公民權，這也是不妥當的。應該結合漢語發展的整個方向來看，健康的發展應該受到鼓勵，不健康的發展應該受到批評。

最後一個問題是語言規範化和語言學家的責任。

在19世紀後期的歐美資產階級學者中間流行着把社會現象和生物現象混為一談的謬誤理論。把這種理論應用到語言學上去，某些語言學家也就把語言當作獨立發展的有機體看待，對它採取一種自然主義的態度：語言是自然發展的，它要變的時候沒有人能叫它不變，它不變的時候沒有人能叫它變，方言的分合，規範的分歧，都是語言自然發展的結果，人們只能聽其自然，企圖加以干涉是徒勞的。如果相信這種理論，人們，包括語言學家在內，對於語言的發展是不能有所作為的。

這種理論的根本錯誤在於撇開語言使用者來看語言，在於不聯繫社會的發展來看語言的發展。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說，文字（以及文學語言）的出現，印刷術的出現，民族語言的出現，都是語言發展史中最重要事情^②。有了文學語言，有了民族共同語，就不能沒有一致的規範。文學語言和民族共同語的形成本身就表示語言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就要趨向於規範化。語言學家應該研究語言的規範，並且通過這種研究促進語言的規範化。蘇聯《語言學問題》創刊號的社論裏說：“擺在蘇聯語言學家面前的任務是確定一個語言的歷史上各個時代尤其是我們的時代的規範的概念。從詞彙的、語法的、發音的（包括重音的）規範的具體的——歷史的理解出發，我們的語言學家應該為各個民族語言編寫一系列的參考書——詞典、正音詞表等等，供給學校和廣大的讀者應用。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各階層人民的文化高度發展，規範性的

① 見《毛澤東選集》，3卷，858—859頁。

② 見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25頁。

參考書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①。

以上這幾個問題都是同語言規範化有關的重要問題，是需要好好地討論的。

三

為了促進漢語的規範化，有幾方面的工作要做。

首先是思想工作。必須改變社會的風氣，要提倡在公共場合說普通話，要促使每一個寫文章的人注意語言的純潔和健康。尤其重要的是要在使用語言上有示範作用的同志們中間取得認識上的一致。語言的規範必須寄托在有形的事物上。這首先是一切作品，特別重要的是文學作品，語言的規範主要是通過作品傳播開來的。在目前的情況下，外國文學尤其蘇聯文學的譯本擁有極大的讀者羣，在語言規範的傳播上起着非常廣泛的作用。作家們和翻譯工作者們重視或不重視語言的規範，影響所及是難以估計的，我們不得不对他們寄予特別大的希望。電台廣播員、電影和話劇演員，他們也都是語言規範的宣傳家，每天有無數的觀眾和聽眾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在向他們學習。他們在普通話的推廣上，過去已經有過很大的功勞，今後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地推行普通話的情況下，他們將起更大的作用，自然也就必須加強自己的語言的規範性。

其次，要有一些行政措施。教育部最近已經定出一個在各級學校推行普通話方案的草案，不久將要成為正式的方案。我們希望這個方案能夠切實執行，保證在校的學生能夠受到全面的規範化語言的教育。文化部也可以採取一些措施加強廣播、舞台、電影語言的規範化，還可以在廣播電台設置普通話講座，進行教學。現在廣播電台和電影都還有使用方言的情況，這在過渡時期是必要的，但最好還是適當地加以限制，不要讓它起鞏固方言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要進行一系列的科學研究工作，這是語言學工作者的責任。

首先是語言學理論的學習。沒有正確理論的指導，工作是不會做好的。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學會把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原理和方法應用到漢語研究上來。特別是關於民族共同語的形成，民族共同語和方言的關係，書面、文學語言和日常、談話語言的關係等等問題需要深入鑽研。此外，對於各國在語言規範化上採取些什麼措施，有些什麼經驗，也應該進行了解，以供參考。

現在來談談具體工作的項目。

(1) 詞典 詞典是進行規範化的最重要的工具。詞彙是語言的建築材料，現在在語言使用上存在的混亂情形一大部分是在詞彙方面。當然，編纂一部比較滿意的詳解現代漢語詞典，不但需要學習近代的科學的詞典編纂法，吸收先進經驗，還需要解決編纂漢語詞典時所遇到的一些特殊問題。無疑問，這個工作是艱鉅的，但是需要是這樣的迫切，不容許我們再推遲下去了。

除了一般性的詳解詞典外，我們還需要各種有特定目的或範圍的詞典。一部附有語音常識的系統說明的正音詞典對於標準語音的推行有極大的用處。一部小型的同義詞典在澄清目前詞彙使用方面的混亂將有很大幫助。

我們還需要有很好的外國語和漢語對照的詞典，如俄漢詞典，英漢詞典等。現在從事科學技術書刊翻譯的人，不一定都是受過本學科專業訓練的，往往要倚賴這種對照詞典。所以這種詞典必須取得各科專家的密切合作，但一般的情況是這方面做得較差的。這種對照詞典對於

^① 《語言學問題》，1952年，1期，25—26頁。

一般詞彙也很有影响，翻譯作品中許多用詞不當和造詞生硬的情形，往往可以追根到這些詞典上。

目前還有一件工作亟待要做的，就是一個標準的通用詞表。因為詳解詞典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完成，先編一個詞表就更有必要。這樣的一個詞表有好幾種用途。第一是促進詞彙的規範化，免得人人造詞，隨便拿漢字來拼湊。其次是可以用來試驗拼音文字。還有一個用途是用來做編輯漢語和另一種語言對照詞典的依據。

(2) 語法研究 這幾年來，學習語法在正規學校和業餘學校裏已經相當普及，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標準的語法教材。我們也常常發現書刊上有犯語法錯誤的語句，可是要批評就得有所依據。在漢語研究的各部門裏，語法是比較有更多的人從事的。應該肯定，從《馬氏文通》以來，許多語法學者都曾經有過一定的貢獻。但是也無庸諱言，現代漢語語法規範的研究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因而在語言實踐中語法的指導作用並不顯著。

這裏碰到一個問題——體系和術語的問題。敘述語法事實必須有一定的體系，而這個體系必須符合漢語語法本身的體系，否則一定不能敘述得很妥貼。幾十年來對於漢語語法體系的爭論是很多的，近年來尤其熱烈。這是應該的，因為大家都在渴望求得真理，而真理不是唾手可得的。不幸的是，幾乎所有的力量都用在體系的爭論上，基層研究還是做得很少，而沒有通過基層研究積累起來的資料，體系問題也是很難得到滿意的解決的。以後的語法研究工作必須雙方並重，才能得出比較滿意的結果。

修辭學和邏輯，這是不在語法範圍但是和語法密切相關的科學。研究語法不能不同時研究修辭學和邏輯，尤其在編寫學校語法教材的時候。修辭學本身也是語言科學的一個重要部門，需要及時發展的。

(3) 方言調查和漢語史的研究 從前在方言區推行“國語”，完全採取直接教學法。在學校裏，這個方法還能收到一定的成效，在廣大社會上收效甚小。假如我們能把各地方言和普通話之間的語音對應情況加以說明，再把常用詞語編成對照表，那就不但學校以外主要靠自學的人能有所依據，就是學校教學也能得到很大的幫助。過去調查方言以語音為主，將來必須兼顧詞彙和語法。

方言調查的意義決不限於幫助推行普通話。方言是研究漢語史的一部分極其寶貴的材料，可以和書面材料相印證，尤其是能夠補充書面材料的不足。漢語史的研究，結合着方言調查，將會使我們更清楚地了解漢語發展的詳細情況，找出許多內部規律，從而指導現代漢語的規範化工作。

(4) 教材和教學法的研究 這是直接關係到推行普通話的重要科學工作。首先要研究正音教學，怎樣把正音法的知識教給學習的人，同時要編寫適應不同地區的正音教材。詞彙教學也是當前語言教學中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連大學語文系畢業的學生，還是經常犯“用詞不當”的毛病，這個情況是很不好的。

這以外還有許多研究工作要做。比如作家語言的研究，翻譯作品語言的研究，朗誦和台詞的研究，這些也都是直接和語言的規化有關的。

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 標準音的普通話

——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的報告——

張 奚 若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部長)

一 漢語規範化的重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高度統一的國家，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和國防上，都已經實現了歷史上所沒有過的統一。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之下，正在為共同的目标——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隨着國民經濟的恢復、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決定和執行，各方面的建設事業和生產鬥爭正在迅速地開展。人民的社会生活有了重大的改變，交通往來和交際日益頻繁。在這樣的情勢之下，人民越來越感覺到使用一種可以到處通行的人人能夠接受的共同的語言也就是規範化的語言的需要，因為語言“既是交際的工具，同時也就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漢民族佔我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漢語是漢民族的語言，首先需要有一個統一的規範，也就是說，有一個標準。這是我國人民社會生活中間的一個迫切的重大的問題。

漢語是世界上最發達最重要的語言之一，並且是世界上說的人最多的語言。但是正由於說的人有五万万幾千万之多，而我國幅員廣闊，長時期交通不便，加以幾千年來政治上、經濟上沒有真正的統一，所以方言的分歧情況相當複雜。有些比較嚴重的分歧，使甲乙兩地的人思想交流發生阻礙。這種情況往往造成工作上的困難，使工作或多或少受到損失。這種情況是跟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要求不相適應的，是對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非常不利的。

方言以外，漢族人民有沒有一種共同的語言呢？有的。這種語言早已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它的形成過程已經經歷了一段相當長的時期。

宋、元以來的白話文學使白話取得了書面語言的地位。元代的“中原音韻”通過戲曲推廣了北方語音。明、清兩代，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官話”隨着政治的力量和白話文學的力量傳播到各地，幾百年來這種“官話”在人民中立下根基，逐漸形成現代全國人民所公認的“普通話”（“普通”在這裏是普遍、共通的意思，而不是平常、普普通通的意思）。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學作家拋棄了傳統的文言，一致採用“白話”寫作，學校教科書和報紙也開始採用白話，這樣就大大地發展了歷史上原有的北方“官話”，加進了許多其他方言的有用的成分和必要的外來語成分，迅速地促進了普通話的提高和普及。現代交通的發展和人民革命鬥爭的發展在普通話的傳播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革命的武裝隊伍走向各個農村、各個城市，到處跟人民羣眾親密團結，生活在一起，一面學習普通話，一面就傳播普通話。這個傳播的作用在人民解放戰爭中推廣到了全中國的每個角落。

根據以上簡略的敘述，可見地域方言雖然存在，但是由方言口語發展而來的共同的語言已

經逐漸形成了。

這種事實上已經逐漸形成的漢民族共同語是什麼呢？這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

很久以來，漢族人民就感到普遍使用這種共同的語言的需要，更希望這種共同的語言能夠進一步規範化，使學習和使用都有個明確的準則。只是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的壓抑之下，這種共同的語言的進一步規範化和普遍使用，都是沒法子徹底解決的問題。中間雖然曾經有過“切音”、“官話字母”等拼音文字在南北試行，但是不過提倡一時，終於遭到挫折而消滅。又曾經有過“國語運動”，在漢語規範化的進程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成就終究不大。

解放以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人民作了新中國的主人，人民民主專政為普遍使用共同的語言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給了有力的保證。全國範圍的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的迅速發展，全國範圍的徵兵制度的實施，更將加速漢語統一的过程。在這樣新的情形之下，提出漢語規範化的問題，提出推行規範化的漢語的問題，就一定能夠得到完滿的解決。

漢語規範化問題在科學界和教育界曾經進行過並且還在繼續進行着深入的研究，反覆的討論，熱烈的爭辯。許多人寫了論文，發表了意見，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教育部還召開了有關這個問題的座談會。到現在，大多數人士已經有了共同的認識：漢語作為整個語言（包括語法和詞彙）來說，它的規範應當以經過文學語言（書面語言）加工了的北方話為基礎；漢語的發音，應當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這兩點都是歷史演變的自然結果。事實上，我們現在不能離開已經在全國流行的“白話”另外去尋找漢語的規範，也不能在北京語音以外去創造一種漢語正音的人工的標準。廣播電台上每天說的話，就是這種普通話——用北京語音說的全國流行的普通話。大家也都同意，應該廣泛地有系統地推廣這種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為簡便起見，這種民族共同語也可以就叫普通話。

為了適應全國人民的要求，加強全國人民的團結，提高全國人民的文化，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保證第一個五年計劃和以後經濟建設計劃的完成，應該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教學和擴大它的傳播，這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任務。

二 推廣北京語音是推廣漢民族共同語的重要環節

語音是語言的物質材料，詞和語句都要用人嘴裏發出的語音來表達。漢語方言的分歧，嚴重地表現在語音上，不但幾個大方言區之間差別很大，就是一省之內，相鄰的市縣也常常有不同的發音。方音對思想交流的阻礙，比方言中的語法、詞彙嚴重得多。我們要推廣普通話，推廣北京語音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我們首先要在這一個環節上大力展開工作。

我國文字改革已經有了明確的方向和目標。毛澤東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們：“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文字拼音化需要做許多準備工作，而統一語音是許多準備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項，推廣北京語音可以為文字拼音化鋪平道路。

當然，這並不是說，普通話的教學和傳播可以只偏重語音，語法和詞彙可以不顧。語法和詞彙在規範化方面也有好些問題，需要深入研究；而且語音發得不錯了，要是用的是方言中特殊的語法、特殊的詞，別地方人還是不能了解。這就是說，推廣民族共同語決不能只顧語音一方面，必須兼顧語音、語法、詞彙三方面，這三方面合成的整體才是民族共同語。不過語法和詞彙的規範可以依靠書面語言來廣泛地影響羣眾。在這個方面，我國現代的著作家、文學家、語文工作者、新聞出版工作者正在作巨大的努力，並且開始得到成績。因此，雖然書面語言的規

範化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究竟已經有了統一的基础。社会上对这个問題也已經比較重視。許多人都在學習語法和修辭，他們在寫作的時候已經習慣於文字上的推敲。在学校的語文教育方面，也已經開始了重大的改变，漢語語法的教學正在逐步取得它应有的地位。这就是說，語法和詞彙的規範已經有了可能通过書面語言的教學和傳播逐步地深入人心。至於語音，却跟語法和詞彙不同。語音的規範不能靠書面建立起來，因為我們所用的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同样一篇文章，甲乙兩地的人都能看得懂，可是如果用方音唸出來，就可能彼此不甚了了，甚至完全不懂。因此，為了實現語音的規範化，我們首先要在口頭語言中大力推廣北京語音。無論在学校的語言教學方面，或者是其他社会生活方面，我們都要提倡學習北京語音。我的報告的重點也放在推廣北京語音的教學和傳播方面。由於文化事業的發展，學習北京語音現在比以前要方便多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員每天播送出來的語音，電影演員、話劇演員在銀幕上、舞台上發出來的語音，都是北京語音的实际例子。我們号召大家學習这种語音，訓練自己的口耳，逐漸做到能听，能唸，能說。我們不难設想，要是絕大多數人都做到能听，能唸，能說，那對我們進行的光榮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將有多麼大的好處。

三 推廣北京語音的方針、步驟和措施

漢語方音差別很大，距離北京語音或近或遠。我們推廣北京語音，不能期望各地齊足並進，也不應有一蹴而致的急躁情緒。我們主張按照各个方言地區的語音情况，按照學習条件的便利不便利，採取“重點推行，逐步普及”的方針，展開推廣的工作。

語音不能憑漢字來教學，必須使用拼音字母，作為正音的工具。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漢語拼音文字方案草案沒有發表以前，我們就暫用注音字母。注音字母經過速成識字教育中的應用，廣大羣眾對它比較熟悉。在目前階段，用它來注音、正音，對教學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對學的人說，首先只要求他學會注音字母，能把注音字母當作“正音拐棍”，依照注音（課本、讀物、字典、字彙或字表上的注音）讀出聲、韻、調，一般準確。這是必要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才能逐漸養成听音和辨音的能力，使耳朵熟悉北京語音的聲、韻、調，听得懂別人的讀書和講話。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掌握一定數量的字的北京語音，逐漸運用到自己的語言中去。

對教的人說，要求當然要高些。除了發音準確以外，還要求儘可能掌握較有系統的語音知識，懂得北京語音跟方音的對應比較。方音的哪一類音，在北京語音裏發哪一類音，這裏頭是有規律的。學的人掌握了這些規律，就不必一個一個音死學，而且正音也比較容易。各地的方音跟北京語音的對應比較各不相同，各各找出規律來，得靠方言調查和科學研究，那是語言工作者的事。但是教語音的人必須掌握本地的方音跟北京語音的對應比較，因為這樣才容易指導本地人學會北京語音。同樣是教語音的人，我們也不作同等的要求。譬如師範學校教語音的教師，我們對他們的要求就要比較高些，因為他們是教師的教師。他們應該掌握北京語音的一切規律，熟悉各種變化，誦讀和講話十分自如。或高或低的要求不可能一下子就達到，我們必須積極準備條件，期能從早做到。

適應社会主义建設的要求，適應全國人民的要求，我們應當積極推廣普通話的教學，擴大它的傳播，要在全國掀起學習北京語音的熱潮。推行必須結合實際，採用多種多樣的辦法，其中重要的一項是儘量利用廣播。在課堂裏教，听的人至多幾百人、千把人，在廣播電台教，听的人就可以多到無量數。廣播電台一定要為這件大事盡力，擔任羣眾的語音教師。凡是不參加固定的學習組織的，都可以從廣播方面學習。現在工業迅速地發展，農業合作化運動普遍地展開，為了改進技術，提高生產，工農業餘教育必須努力加強。推廣北京語音的工作應該在可能

条件下跟这些工作結合起來。

小学和中学應該首先用北京語音教學。在不久的將來全國是要實行普及義務教育的。我們應該充分利用小学和中学，使普通話隨着教育事業的普及而普及，使新生一代都能受到語音訓練，學會講普通話。小学階段是學習語音最好的時期，兒童在教師和成人有意識有計劃的教學和影響之下，能很快地學得很好。中學學生年齡漸大，可以接受一些系統的語音知識，結合語言實踐，矯正發音。這兩個階段是教學語音最理想的時期，所以小学和中学是推廣工作的重要陣地。先在語文科使用，逐漸普及到其他各科。我們已經定出訓練在職語文教師的辦法。語文教師受了訓練，不但教學生，還可以幫助同校的其他教師。其他教師熱切期望學會北京語音，有了幫助，就不難逐漸學會。這樣，就有希望做到各科課堂教學，師生都用北京語音。當然，早就學會了北京語音的教師儘可以先用。豈但小学和中学，將來的遠景應該是各級各類學校的各科課堂教學，師生都用北京語音。豈但課堂以內，課堂以外的各項活動，彼此交際，難道不應該都用北京語音嗎？孟子所說“置之莊嶽之間”的話頗有道理。有了這樣的好環境，無論教師和學生，熟悉和使用北京語音就不成什麼問題了。

中等師範學校培養小學教師，高等師範學校培養中學教師，師範生的語音直接影響他們將來的學生，關係到他們將來的學生對課業的了解，所以師範學校也是推廣工作的重要陣地。推廣的次第跟小学和中学相同，先是語文科，逐漸普及到其他各科。師範生畢業以後，決不限於在本鄉本土擔任教師，如果滿口方言方音，即使有滿腔的服務熱誠，工作也很難做好，他們的學生也就太吃虧了。而且，受影響的豈止他們的學生！最近教育部通知各省、市舉辦小學語文教師語音訓練班，就有江蘇省無錫師範學校的一個畢業生寫一篇文章登在《語文知識》上，根據他的實際經驗對語音訓練班表示擁護。他的文章裏說：“在實習完畢後總結時，許多同學都後悔自己在平時不該不認真學好普通話以致影響了課堂教學。現在，我校400名本屆畢業生，有157名被分派到蘇北徐州、揚州、淮陰三個專區去工作，大家都在認真地學習注音字母和普通話，因為我們知道：如果不學好普通話根本無法上課（蘇北小朋友一句也聽不懂蘇南的方言），這就要影響國家建設人材的培養，也就要影響社會主義建設”。這幾句話應該引起教育行政部門和師範學校的注意，也應該引起在職教師的注意。為了配合首先在小学和中学推廣北京語音，我們主張讓即將畢業而沒有受過語音訓練的師範生補課。

推廣北京語音，要從以下幾項展開工作。

（一）訓練師資 要推廣普通話，各地必須抓緊訓練師資這個關鍵。教育部已經作出決定，從1955年秋季起分批訓練全國小學的語文教師，使能擔任小學的北京語音教學。現在小學語文教師語音訓練班已經有不少省、市辦起來了。沒有辦的也在準備辦。但是應當指出，許多省、市對這一工作的重大意義是認識不夠的。教育部對各省、市也沒有給予具體的指導，進行嚴格的檢查。這是錯誤的，必須加以糾正。在最近的將來，我們還要在各省、市開辦中學和師範學校語文教師語音訓練班。我們還計劃在北京開辦北京語音研究班，培養骨幹人才，以便分往各地推動工作，兼作方言調查工作。除此以外，全國各級師範學校要在“漢語”課內加強正音的教學。將在1956年畢業的師範生（在高等師範學校是指中國語文系、科的学生）沒有受過正音訓練的，必須在畢業以前補習。這樣，師範畢業生不用再加訓練，就可以擔任教學。

（二）廣播電台設置北京語音講座 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門跟各地人民廣播電台合作，在廣播節目內經常設置北京語音講座，便利小學、中學語文教師的溫習和進修，也便利其他教師和一般人的學習。內容除講授北京語音的規律以外，應該特別注意本地方音跟北京語音的對應比較，指出學習北京語音和改掉方音的有效方法。也可以按照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俄語講習班

的办法，組織听众，系統地進行教学。此外还可以把小学、中学的語文課本或者选择一些文学作品，按北京語音廣播朗讀並灌製唱片，以便听众跟着學習。

(三)編製圖書、教具 从速編印“正音字典”(較詳备的)、“正音字彙”、“正音字表”(只收最常用的字)和“普通話詞彙”(逐詞注音)，作为教学和个人自修的依据。此外輔助教学的教材如“廣播材料”、“注音讀物”等，教具如掛圖、留声片等，也都要相应地及時編製。

(四)開始教学 从1956年秋季起，小学一年級結合“語文”課，初級中学一年級結合“漢語”課，教学北京語音。其餘各年級也應該設法在語文課內補習注音字母，並結合“語文”課或“文学”課的生詞教学和朗讀練習，在語言實踐中应用。

(五)重點試驗，總結經驗 在小学、中学開始北京語音教学的同時，我們要分別地區，选择一些重點学校，試驗一些教学方法，創造經驗，總結經驗，以便作進一步的研究，把优良的教学法向全國推廣介紹。

(六)制定獎勵办法 對於推廣普通話有顯著效果的，學習普通話有优良成績的，制定办法分別給予獎勵。

(七)普遍展開宣傳 推廣北京語音的工作開始，我們要展開宣傳，由報社、雜誌社、出版社、电台組織稿件，說明方音分歧对祖國建設的妨害，講明推廣北京語音的意义，研究語文教学中的正音方法，介紹优良的教学經驗，或者系統地淺明地介紹語音知識。總之，我們要使大家重視这件大事，有徹底的了解；我們要从思想上動員，打破怀疑、畏难等种种顧慮，用科学原理說明正音教学是必要的而且能够收效的，北京語音是容易学会的。

为了展開工作，教育部已經設置了專管推廣普通話的機構。各省、市教育廳、局要設置專職幹部管这件事。各縣文教科也要把这件事管起來，有關語言專業的問題可以跟当地小学、中学和師範学校的优秀的語文教師联系。有了專管的人員，就要結合具体情况拟訂推廣普通話的計劃。

四 推廣普通話的教学，擴大它的傳播，是一个嚴肅的政治任务

前边說过，普通話不僅是語音，还有語法和詞彙兩方面。因为統一語音的任务最迫切也最困难，所以我們特別注意語音方面；但是，这並不是說語法和詞彙兩方面已經沒有問題，再不用研究，再不用進一步規範化。這兩方面問題还很多，必須深入研究，建立明確的規範，才能使大家學習和使用都有準則，思想交流毫無障礙。

推廣普通話的教学，擴大它的傳播，是一件大事。为了適應廣大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央已經決定大力展開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是艰鉅的。但是我們的信心很强；因为在中国共產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發動羣众，依靠羣众，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們熱切地希望語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聞出版工作者和其他文化工作者積極地行動起來；我們希望文学作家用自己的作品支持这个工作，一部人人喜爱的作品，要是用規範化的語言寫出來，那影响就太大了。教普通話是一个嚴肅的政治任务，教師們要担起这个光荣的任务，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語言修养，要克服一切教学上的困难，發揮積極性和創造性，研究有效的教学方法，使学的人学好普通話，学好民族共同語。学普通話也是一个嚴肅的政治任务，我們希望学的人都能認識到這一點。教普通話，学普通話，都是为了祖國更進一步的統一和發展，为了建設社会主义这个光荣偉大的事業。如果大家都能有这样一个共同認識，我們的工作就一定能成功。(1955, 10, 19.)

曲艺工作者应该怎样进行推广

语言规范的工作

吳曉鈴

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進行的第六天，10月30日，是个星期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說唱团在这天的下午給出席的代表們演出了八个精采的曲藝節目。这八个節目是：馬增蕙的牌子曲“大窗帘”、新嵐雲和趙玉明的梅花大鼓“秋江”、馬增芬的西河大鼓“大方人”和“花唱繞口令”、刘宝瑞和郭全宝的相声“投其所好”、荣劍塵的岔曲“疾風驟至”、王月華和刘淑敏的山东琴書“裝灶王”、孫書筠的京韻大鼓“英雄黃繼光”、侯宝林和郭啓儒的相声“打百分”。我們說“節目精采”是因为：演出的形式是多样化的。作品的內容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相当强。演員是优秀的，甚或是典型的。特別值得提出來的是，荣劍塵老先生很久以來就不做業務演出了，这次竟不辞勞苦地表演了他的傑作。同時，我們說“節目精采”还有着更深的意义：这不是一个類似文娛性質的晚会，这是曲藝工作者通过節目的演出，用实际而具体的事例來和語言工作者討論应该怎样進行推廣現代漢語規範化的工作。曲藝工作者首先主動地接受了这个艰巨的政治任务，侯宝林同志說“我們一定要做普通話的勇敢的宣傳員”，語言工作者听了是感動的，振奋的。

在節目表演結束以後，曲藝的作家、演員、樂師和語言工作者三个一羣、五个一夥地展開了自由而愉快的談話。在談話裏，大家更進一步地明確了現代漢語規範化工作上的一些帶有原則性的問題，並且取得了一致的認識。

首先，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曲藝工作者完全有可能、有必要參加推廣普通話的工作。甚麼是可能呢？就是：儘管曲藝的形式有許多是具有地方色彩的，甚至於那些地區的方音色彩和普通話的標準語音有着較大的距離，但是，從節目的演出裏我們看到了方言向普通話靠攏和方音向標準音看齊的歷史發展的必然途徑。西河大鼓和山東琴書的地方性本來是很強的，“大方人”、“裝灶王”兩個節目告訴了我們不單在藝術上大大地提高了，進步了，而且有了新的發展了，就在同時，語音也百分之九十的符合了北京語音的標準。我們必須認識到它的提高和發展是和語音的轉化分別不開的，由於它突破了區域性的局限才能夠為更多的不同地方的廣大

人民所喜愛，也就由於它的觀眾數量的遽增才使它得到更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條件。還有甚麼是可能呢？就是：有些曲藝的形式儘管地方色彩非常濃厚而在語言方面又和普通話沒有甚麼矛盾；但是在它的語音、語法和詞彙方面也已經逐漸地服從了普通話的規範。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相聲，在從前的時候，不是地道的北京人很難聽得懂相聲，應該說，要是把相聲裏的北京土語的成分取消的話，它就失掉了它的特點，因之也就可能失掉了它的生命。可是在“投其所好”和“打百分”兩個節目裏我們聽不到像“非糟不糟”（“一定糟”的意思）“去甚麼去”（“做甚麼去”的意思）的語法結構，聽不到像“豬肉櫃子”和“羊肉牀子”（“豬肉店”和“羊肉店”的意思）的特殊詞兒，聽不到把“和”（hé）讀成“和”（hè）、把“論”（lùn）讀成“論”（lún）的個別土音。這就充分地說明了曲藝工作者捨棄了北京方言的特殊性，服從了普通話的一般性。這個做法是符合從分歧到統一的自然法則的，因此它並沒有失掉了它的生命，相反地，它的生命更加活潑而旺盛。在這方面，我們要向曲藝工作者致敬，他們沒有認為語言是地方性藝術形式的突出特點，萬萬變不得，他們認為人不是不能為力的，所以勇敢地做了大膽的人為的改革。他們很客氣地說“我們這是自發的為規範化服務”，嚴格地說來，這話對於語言工作者可能寓有激勵的意思，曲藝工作者在語言工作者沒有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已經在這方面做了實踐。我看不能把這看為是“自發的”，必須說是由於“預見性強，眼光放得遠”的緣故。

從上面提出來的情况来看，曲藝工作者完全有可能參加推廣普通話的工作，客觀條件非常好。

甚麼是必要呢？事實說明，曲藝在全國範圍內是多种多样的，各个地區都有，而且發展的形勢不很一樣，有的走得快，有的慢一些，也可能有少數的還由於狹隘的保守觀念沒有移動腳步，抱殘守缺。在一定的規範之下的“百花齊放”（我們應該理解“百花齊放”並不是採取自然主義和自由主義方式的）是完全必要的，這就需要曲藝工作者還得大大地加一把勁兒，特別是先進者們，除了實際行動之外，說服、動員、講明白道理也不能放鬆。譬如說：推廣普通話、方言服從民族共同語，

絲毫不会損失地方曲藝形式的風格和色彩，这个道理就得交代清楚。結合上实际來講，可以拿歷史上的事实說明。例如：怯大鼓變成京韻大鼓主要的是語音的標準化，京韻大鼓成為提高了的形式。也可以拿現在的事实說明。例如：近幾年來山東快書的發展並不是由於保留山東方言的特色，高元鈞同志的努力成果之一是縮小方言的使用範圍，回婉華同志在北京的天橋市場完全用北京語音表演山東快書得到觀眾熱烈的稱賞。為了促使全國各地的曲藝形式並肩朝着“百花齊放”的發展路途走去，為了達到通過曲藝的形式向羣眾進行政治教育的目的，曲藝工作者有必要參加推廣普通話的工作。也不必諱言，有些曲藝工作者對於推廣普通話的必要是認識的，但是他們的語言還不很夠標準、純潔和健康。这就更有必要從本身做起。要知道：布尔什維克語言的力量在於它的深刻的思想內容，它的強大的邏輯力量，它的真實和通俗簡單。曲藝使用的是口頭語言，所以要更加注意它的提供材料的方式，不只是內容。具體說來，就是要學習掌握語言，要學習掌握普通話的規律和規範。這件事情和勤學苦練的勞動是分不開的，對自己的語言的關心成了習慣，語言的素質才會開始有顯著的改善。在這次的演出裏，我們還發現了從優秀的演員的嘴裏唱出來不應該讀尖音的尖音。曲藝的作家雖然沒有大量地使用“地流平”、“馬走戰”等毫無道理可講的構詞方式，但是“開言有語把話明”之類的套子還沒有能夠連根拔出去。古語和現代語的混用，文言詞和口語詞的夾用，而且夾雜得很不自然的情形也還不少，例如：梅花調的“秋江”在藝術上的成功是肯定的（吸收了那麼豐富的曲調，特別是在南板的基礎上加入了北板的成分，可以說是創造性的改進。），可是唱詞裏既有像“梢公”那樣的舊詞，又有像太簡單”的“簡單”（這個詞在現在有了新的意義，例如：“那個人可不簡單”。）的新詞，讓人聽來總覺得有些不太調諧。

從上面提出來的情况看來，曲藝工作者完全有必要參加推廣普通話的工作，而且要嚴格地要求從本身的語言合乎規範做起。找出自己語言上的缺點，把它消滅乾淨，这样就為從事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打了下堅強的基礎。

其次，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曲藝工作者在進行推廣語言規範工作上有些甚麼事情要做呢？我們說，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當然，首要的事情是在演出工作裏同時完成政治宣傳員和語言規範宣傳員的任務，更廣闊地擴大宣傳的區域，更多地擴大聽眾的範圍，更正確地起着在普通話方面的示範作用。除了這個，還可以直

接、間接地做些有利於普通話推行的事情。例如：話劇、電影工作者在語音的基本鍛鍊上還沒有摸索出來一套有效的方法，那麼曲藝工作者把傳統的練聲方法加以科學性的總結（不能用“腦後音”、“丹田氣”來說明）傳授出去，就能推進舞台和電影語言的提高（我在這裏特別指的是發音器官的控制，話劇和電影演員在目前感覺最煩惱的是聲音不能“打遠兒”，“嘴勁兒不夠”，可是曲藝演員在這方面最有成績，真是“唱出來的聲音一直送到劇場的後牆上還能撞回來。）。例如：有些方言區的人在某些聲音上不易區別，總是混雜在一起，曲藝工作者就可以想些辦法幫助他們在學習普通話的時候解決具體困難。像是有人“フ”和“Δ”分不清楚，就可以由曲藝工作者推廣類似下面的繞口令：“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誰說十四是四四，就打誰十四。誰說四十是十十，就打誰四十”。繞口令在糾正語音方面是很好的方法，我們特別重視馬增芬同志表演的“花唱繞口令”的原因就在這裏。我們建議曲藝工作者選出些在語言上有示範性的節目，再有目的地創作些對於語言規範化有益的節目，製成留聲機片，這可以輔助普通話的教學工作，因為它比專教 ㄅ、ㄆ、ㄇ、ㄋ 的留聲機片活潑得多，生動得多。有些參加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的高等學校教師代表們提出這樣的意見：曲藝工作者可以試驗一下把古典文學作品譜出、唱出，或者是朗讀出來。例如：用岔曲唱或念詩、詞、民歌，用牌子曲唱成套的散曲或者是劇曲裏的片段。這樣，李白的詩，辛棄疾的詞，睢景臣的“高祖還鄉”散套就能够在二十世紀的今天重新有了新的聲音，而且，對於中學和大學的文學課的講授一定有很大的幫助。當然，這個事情不容易，存在着許多技術上的困難，可是，這也是一條可以嘗試的道路，對於曲藝本身的提高與發展很可能有好处，值得考慮考慮。再有，就是語言工作者誠懇地希望曲藝工作者（包括作家和演員）能够大量地創作並且演唱宣傳現代漢語規範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作品和節目，用生動而具体的事实說明規範化的好处，不規範的坏处，擴大影響，說服動員，打消羣眾的不必要的顧慮和由於認識不夠清楚而引起的懷疑。這個工作是極有意義的。

從上面舉出的例子看來，曲藝工作者在進行推廣語言規範工作上能够做和應該做的事情是不少的，我們多開動腦筋，多鑽研鑽研業務，事情還要多。越多越好，因為我們都有決心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以忘我的勞動從事創造文化建設高潮早日來到的條件，這是和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前進不可分割的。

教學北京音的点滴經驗

——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的發言——

徐世榮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現代漢語及實習》一門功課裏有一部分是“正音學”，我在1955年春天擔任了這一段課程的講授。教學共歷8週，由於中文系及語言教研室的正確領導，同志們的協助和師生的共同努力，獲得一定效果。現在把這一段教學中的經驗——教育理論、語音學理論和教學實踐結合起來的點滴經驗，簡括地報告出來。

一、學生的實際情況

這班學生人數較多，共246人。在師大已經學習了一年半，——也就是說，其中的每一個人最低限度已在北京生活了一年半。學生來自四面八方，但統計起來，南方人多，江、浙、閩、粵以及川、鄂、湘、贛等地的同學約佔全班的百分之八十，其餘約百分之二十是北方人。北京人和能說北京話的同學很少，不過十幾個人。

全班同學有幾個較好的學習條件：

(1)在一年級時學過《語言學概論》，其中包括語音學(約計6週時間)，這一部分的理論知識是現在正音學的教學基礎。

(2)學生學習北京音的要求十分迫切，可以用一位江南同學在教學開始時給我的一封信裏的話做代表，他說：“……到北京一年多了，而我始終保持着一口家鄉的口音，在現實生活中使我感到非常苦惱。我的語言不能順利地作為交際工具，我很想學北京話，也曾努力過，……即使當場糾正了，換了場合，過了些時候，又唸不準了。我們很快地就要到中學去實習了，學生听不懂，教的再好也沒有用；況且我又是語文教師，老這樣怎麼能完成祖國交給我的任務呢？我怎樣才能學好北京話，這成為我經常考慮的一個嚴重問題”。這種焦急的心情確實可以代表大部分同學。但這樣的迫切焦急的心情也就成為學習的力量之一。

(3)學習的情緒高，極大多數的同學都肯自覺的努力。他們是把學習北京音當成一個任務來進行奮鬥的。甲班(二年級分為甲、乙兩班)全體同學在教學三

四週後給我的信中說：“說到正音學的學習，我們的情緒一向是很高的，勁頭和信心也是很足的。南方的同學對[p][pʰ][m]……發生親密的感情，北方同學也不疏遠它。許多同學每天都抓緊時間，隨時練習。有時為了怕妨礙別的同学，就跑到操場上或洗臉房裏對着鏡子唸u、<、t、u、x、p、q、&。這種火熱的情緒，保證了學習效果”。

(4)有熱情負責的“班長”、“學習幹事”，有勇於承擔輔助任務的北京同學和能說北京話的同學，他們在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主動地組織同學練習，爭取教師輔導，互相督促幫助。有一次最讓我感動，就是在下課以後，還有一位同學向我提問題，這時走過一位同學對我說：“老師，您去休息吧！我可以告訴他，替他給他解答”。就因為有這種集體互助的精神，使教學能更順利地進行。

二、時間的安排和分班、分組的辦法

我們現在雖然正在學習蘇聯“大班講授，小班練習”的方法，但是有些條件還不夠。因為沒有200多人的大教室，只好分為甲、乙兩班，每班120多個人。又因為教室不夠用，受其他課程限制，學習時間不能過於分散，練習時間不可能分成過多的小組，所以只能把200多人分為四個小組，每組60多個人，進行練習。

嚴格地說，應該按學生的方言區、生長地來分組，問題可以集中，教學就更方便，但實際有困難，只好混合起來。這樣又有一定的好處，一組裏的學生能實際接觸到許多方音的現象，經過教師分析，對漢語語音問題能更具體地認識。在教師矯正每個學生的發音的時候，正可以學到各種切實有效的方法，為自己將來中學教學正音做好準備。

十幾位能發北京音的同學被分配到四個小組裏，為的是他們能在各組中起作用。

講授和實習的時間比例是2:2，每週講兩點鐘，練兩點鐘。

三、課程內容

講授內容以簡要適用為主。這班學生雖然在一年前已經學過語音學，但是為了正確地指導實踐語音方面的理論知識，還必須揀擇精要或斟酌加深加細地複述一番。這樣作法，便於喚起舊印象，補充新知識，準備進行技能、技巧的培養和訓練。因此，學生並不感覺理論知識重複。

內容注重最實用的東西：枝節的、細微的、可學可不學的暫時不學。如北京的土音“板凳”的ㄅㄣˊ[tʰɨŋ˥]，“閉上”的ㄅㄧˋ[pin˥]，“死判”的ㄅㄧˋ[kʰəŋ˥]（如“死判功課”），就不包括在“基本音”410個音中，不教給學生。連音變中可能出現的音素，像濁輔音[b][d][g]、元音[ʌ][ɜ]等，在初學元音、輔音時就不必學，留到以後再說。

由講授知識到訓練技能、技巧的過程很緊湊，每講完一個單元（例如元音），跟着就進行多種多樣的元音練習（練習方法詳後）。使學生在學習（或者可以叫做複習）理論知識時就做好思想準備，知道這些知識內容馬上就要跟自己的發音技術結合起來了。因此他們在听课時都很積極。

講授的內容就是：導言，發音器官，音標簡介，輔音，元音，聲韻，結構，音位，拼音，聲調，輕音，重音，音變，語氣（句調、停頓、速度），字音（語音和讀音，又讀）等。總括來說，是由分開的（音素），講到連合的（音綴、詞、語、句）；由正常的，講到變化的（音變）。最後歸結到一份三千多字的“正音字表”和十幾種注音的“朗讀教材”。

四、教法

(1) 思想動員

這是教學中一步重要工作。八週中分三次來作，第一次在開始“導言”中，講明正音學跟語音學的關係，課程的性質為什麼學北京音作規範，然後結合學生本身——即將擔任語文教師，來談正音的必要。針對學生的各種顧慮進行說服，使他們打消顧慮，堅定信心，準備頑強地學習。另外對北京同學和能說北京話的同學作了安置，告訴他們一定也要參加學習並準備在同學中起輔助作用的道理。

第二次是在三、四週後做的。這時發現有人因遭遇困難動搖了信心，或因成效不太顯著而鬆了勁。於是一面在課堂上加以勉勵，一方面利用春假，和全體同學做了一次書面談話，揭明學習中存在的難點，指出典型的同學是怎樣努力克服困難的，鼓舞同學不要向困難

難低頭。

第三次是在最後一課的結束語中，肯定了學生們的學習成績，說明上課雖止於此，但仍需熟練、進修。告訴他們要鞏固已經獲得的技能，隨時隨地練習，經常唸“正音字表”和“朗讀教材”；大胆用北京音說話。給同學佈置了八週講授後的自學工作。

除此三次外，還在每一個單元小結時加以鼓勵。

全班同學對學習北京音的嚴肅性本來已經認識清楚，再通過這幾次講話，更提高了學習熱情，並且能保持下去。

(2) 結合實際

甲、考慮學生的要求和可能達到的限度。

這一班學生迫切要求學習首都語，可是有百分之八十的學生是來自遙遠地方的，語音相距很遠，學習時困難自然要多，我們若在八週內要求於學生的過高，譬如希望學生通過八週的學習就能說純熟的北京話，那就是不實際的了。按照總的“教學計劃”，“現代漢語及實習”一科的目的是“使學生掌握現代漢語的規律，並能把它熟練地運用到講讀和寫作中去。”內容規定着：“……說明現代漢語的語音，……各項規律和各項規律相互間的關係”。“正音……的講解和訓練。”依據這個原則，結合學生的實際，我們就可以這樣具體地要求學生：除獲得現代漢語語音的一切知識外，並應通過實習，掌握技能——能按照音標、符號、字表、字典等發出首都語音，運用到講讀中去。這就是說，在已有充分準備、有意識地努力克制自己方音習慣的時候，可以唸出正確的首都語音。如果個別的学生，有更好的條件，能突破這一限度，進而養成“熟練技巧”，可以不再倚賴音標、符號、字表、字典等工具，自行發出正確的首都語音，那自然更好。我們開始時就把這些話告訴學生，使學生感覺到有可能達到目的，由此樹立信心。

乙、了解學生語音上存在的問題。

其次要明白學生語音上存在的問題，要大致掌握各主要方言區的方音特點，針對他們的問題，決定教材及實習的重點。譬如這班學生裏廣東人特別多，我們在教学輔音、元音時，就要把ㄌ、ㄋ、ㄒ、ㄆ、ㄑ、ㄒ、ㄓ、ㄔ、ㄕ、ㄖ、ㄗ、ㄘ、ㄙ等當作重點來多加講解，多作練習。在拼音時，讓學生注意“介音”音素的作用。假如不管這個，只做一般的講述；班上分明沒有一個西北人，而教師還一味地詳釋“唇齒塞擦音”的[pf][pf']和“舌尖後塞擦音”[tʂ][tʂ']的區別，結果是勞而少功，迂闊無用；眼前的問題，並沒解決。

特別是在實習課中，每個學生都暴露了語音上的問題，這時就要不厭煩地逐一解決。同方言區的学生，

母兩式注音的。先听这种教材的“範讀”餘音，以後就依据教材上的注音來朗讀。如是剧本、對話，就由兩人或幾人分讀，或用“接力”的方法，由全組學生把一篇教材念完，每人集中精神念幾句。這時的要求，不只是把每一字的聲、韻、調、重、輕念對，還進一步要求念出句中的語氣、句調、快慢、停頓等。為了在實習課堂上不多費矯正時間，念得更好，就在課前佈置，使學生在課外練習，準備。同時做到課外認真練習的效果。

丙、練習標符号

音標(國際音標)、符号(注音字母、聲調、輕重音等符号)是我們正音的唯一有力工具，要求學生一定要掌握到爛熟的程度，一定要看見它就能念出聲音，聽見聲音就能用它記出。實習課上，在听寫、念詞、朗讀時，就兼收熟練音標、符号的效果。

此外還有課外作業。在學了發音器官之後，課外作業主要是練習運用最活動的發音器官——舌頭，讓學生練習舌頭的各种活動；也練習唇的收斂與開放，聲帶的振顫，鼻孔的出聲，要求學生對着鏡子練習。學過輔音、元音、拼音、聲調……都要求學生課外練習。學生們很努力，有人把音標、符号寫成小卡片，放在衣袋裏，隨時拿出來念。課外的練習，大都布置得很簡單，但是大部分同學都能認真去做。

有些同學感覺自己練習困難，自動要求輔導。教師除了在教室裏作較多數人的輔導外，有時到他們的寢室中給十個八個人輔導，當面矯正，可以詳細地說，收效較大。

(4) 盡量使用直觀教具

正音學是以生理學、物理學為基礎的，在講到器官的活動、音響的形成時，只是概念的講解，學生就不容易弄清楚。直觀教具十分重要，通過學生的各种感官而領會，就可以獲得更具体的觀念。開始我注意到這一點，自己給製了大幅的發音器官圖和輔音發音部位、方法示意圖、元音舌位圖。學生看了這些掛圖，覺得對發音有幫助，要求縮印成小幅，每人一套，便於課外練習。這都做到了。以後又受了蘇聯專家費拉托夫的啟發，決心在使用直觀教具這一方面加強力量，又給製了大幅的表示聲調的樂譜。課外還讓同學觀看了喉頭、聲帶部分的石膏模型。

在實習時間和課外輔導、練習時間使用了“注音字母教學留音片”和鋼絲錄音機的錄音。這次教學，錄音機對我有很大的幫助。我自己灌製了聲調、重音、兒化等三套練習材料，重複放送幾次，學生跟着念，很得力。另外還組織學生灌製了六種朗讀教材，學生們深感興趣。凱洛夫《教育學》上說過：組織學生來自製教

具，對於學校是很有益的；並且這種工作具有巨大的教育意義”。我就是本着這個精神來做的。這六種教材是《龍鬚溝》(剧本，老舍作)、《明朗的天》(剧本，曹禺作)、《平常的事》(詩歌，未央作)、《毛主席我選舉了您》(散文，老舍作)、《毛主席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致的開幕詞》以及《日常生活對話》等。都是由學生選定的最喜愛的文字，由他們自己逐字逐句注上音，再由自己發音、錄音。放送的時候，大家特別感覺親切，特別高興隨着朗讀。

(5) 尋找竅門兒

矯正學生發音是有困難的，但是也从各種試探裏發現了一些有效的方法。

指導發音，完全要依据科學的理論，如輔音發音的部位、方法，元音發音的舌位、開閉、唇形，都要使學生理解、領會。但只有這正面的講授還是不行的，有人雖心知其理，實際運用起唇舌來却很困難。我親眼看到用功的學生在練習發音時緊張吃力的情形，為了發一個他自己不習慣的“ㄣ”音，兩腮肌肉痙攣，面紅耳赤，十分着急。所以除了理論的講授之外，我們還必需給學生以具体、切實的幫助。這種幫助的方法便是一些小小“竅門兒”。這些“竅門兒”其實很平常，不過是從旁幫助、促成正確發音的一些手段。主要的方法有下面這些。

甲、固定法 有人在發音時控制不好舌頭，不能使舌尖固定在一定的位置，越着急舌頭越伸縮不定。廣東、廣西同學十九因此念不好“齒背音” P 、 $ㄆ$ 、 Δ 。這就可以使用“固定法”，讓他把舌尖放在上門齒間，輕輕咬住，發“齒間音”。“齒間音”雖非“齒背音”，但聽起來相差不遠，而且最大的用處就是練習把舌尖穩定，養成舌尖極力前伸的習慣。有了這個能力之後，再讓他稍縮進一些，停在齒背地位，就很正確了。

吳語區以及東北同學 $ㄣ$ 、 $ㄨ$ 、 $ㄩ$ 念不好，總是舌尖前伸，碰上牙齒，變成 P 、 $ㄆ$ 、 Δ 。我就用了一個方法，固定他們舌尖捲起的位置。一方面先教他們明白怎樣捲舌，怎樣和 P 、 $ㄆ$ 、 Δ 的平伸不同；不要捲的太過，但也不許太前，只是對準上顎凹入部的前端。學生拿不準地位，感覺困難，多半仍傾向於前伸。我就讓他們把自己的拇指伸進嘴裏，貼在門齒背後，把指甲蓋向着舌尖，教他們努力捲舌，照着正確的方法發音。提醒他們要注意，不要舔濕指甲蓋，如果發音後，拿出拇指，指甲蓋上有唾痕的便算失敗。這樣一來，同學都小心翼翼地，但同時也是趣味盎然地完成了這種試驗，個個成功。

乙、引導法 用別的音陪伴着或帶領着引導出某一個音的順利發出。有人不會念“ㄣ”，第一步姑且允

許他念“**u**”（因為他的日常語言裏有這個音綴，所以容易念出），然後使他拖長聲音，自己体会後部的舌位以及口腔開閉的程度，就知道拋掉“**u**”這個音素後發“**ü**”音的方法了。

一個同學念“**ü**”困難，總是鼻音的“**ü**”。我就讓他念一連串的“**ü**”，然後念“**üüü**”，“**ü——ü——ü——üüü**”，在他念完第三個“**ü**”，就要念“**üüü**”的時候，提醒他：“氣從原路——嘴裏出來，不要改道，不要往上——不要往鼻腔裏跑！”如果糾正成功，這是用“口音”的“**ü**”引導發“口音”的“**ü**”依“慣性”不走鼻音的路。

丙、觀察法 廣東、福建、客家同學都不會發“捲舌元音”“**ü**”，若是面對面教，摹仿不能很像，他自己怎麼沒有達到一定的捲舌程度，自己也不知道。最好師生兩人並肩照一面較大的鏡子，教師發音，讓學生觀察；同時讓學生摹仿，讓他自己觀察。這時他會恍然大悟，發現念不對的原因，是舌頭根本沒有捲上去。圓唇“**ü**”與不圓唇的“**ü**”（四川、閩、廣都不會發“**ü**”），發“**ü**”音時雙唇突出程度（如雲南人感覺困難），“**ü**、**ü**、**ü**”上下牙齒的距離（兩廣人拿不準），都可以用這個方法矯正。練習八個標準元音由閉而開的分寸，用這個教法尤其便利。

丁、局限法 人為地對發音器官的某部分活動加以限制，使他改發正確的音。如發不好“**ü**”音，總是“**ü**”音（如閩南、四川），除告訴他“邊音”的正確發音方法外，還可以用捏住鼻孔的方法促成舌的兩邊出氣。

“**ü**”和“**ü**”，“**ü**”和“**ü**”，教學時很困難，有的地方不會發“**ü**”“**ü**”，尤其是“**ü**”（如山西、南京、廣東、浙江），除使他們透徹明白其區別關鍵在“**ü**”與“**ü**”之外，還要用“局限法”來輔助促成。第一步先讓他發“**ü**”“**ü**”，同時讓他自己輕捏兩個鼻孔，只留很小的空隙通氣，這時他若再使舌根成阻，念“**ü**”“**ü**”，就感覺不舒服。在這時，我就指導他：“舌尖向前伸，頂住下牙床，發音！發音！”“**ü**”和“**ü**”就很好地發出來了。

戊、誇張法 為了矯正，第一步不妨“矯枉過正”，第二步再要求完全正確。如有人“**ü**”“**ü**”“**ü**”念不好，總是“**ü**”“**ü**”“**ü**”，就讓他捲舌，可能捲的過度，念成“**ü**”“**ü**”“**ü**”，第二步只要告訴他“不要太向後，向前移一點”，就可以了。

“**ü**”“**ü**”“**ü**”念不好，我讓他把舌尖下垂，頂住下齒，使舌面突出，用力向硬顎貼。這時也許有人太用力，變成“舌面中”音的“**ü**”“**ü**”“**ü**”，不要緊，第二步指出，使他舌面前移些；再熟一點之後，指出舌尖也可以不頂下齒，這就成功了。

己、突出法 突出發音中某一階段，使學生能感覺兩個音素不同。如“**ü**”“**ü**”兩音，特別讓學生注意“除

阻”以前的發音，而且着重練習這一段“唯閉音”。即使發完全的音，也可以拉長“成阻”“持阻”這一段。這不但有益於“**ü**”“**ü**”兩音的分辨，也有益於“**ü**”“**ü**”“**ü**”“**ü**”的分辨。

“**ü**”“**ü**”兩音混淆，也可以使學生注意“**ü**”的“唯閉音”，領會“鼻音”的特點；注意“**ü**”在未“除阻”前舌尖抵住上牙床、舌頭兩邊出氣的特殊發音法。學生因為特別注意這種特殊的“邊音”，學習這種特殊的“邊音”，自然不再發和“鼻音”的“**ü**”。

（6）組織力量

240. 多位學生中，10幾位北京同學和能說北京話的同學成了我的好助手。開始講課後，即把任務明確地交給他們，請他們上課時認真地學習理論，下課後主動地幫助別人。中間也曾請他們彙報在幫助工作中發生的困難，我也和他們討論了解決的辦法。在作“朗讀教材”的注音練習時，請他們不厭煩地把文中字句用北京音念給同學聽，好讓同學照着練習注音。在灌製朗讀錄音時，由他們擔任發音。這十幾位同學完成了他們的任務，在教學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班長、學習幹事，也是我的好助手，他們做了許多有益於教學的工作，使同學的學習熱情貫徹下來。

（7）關心學生，同學生在一起。

這門功課既是“技術性”的課，對於學生就沒有理由不一一接觸，隨時檢查他們的學習情況，替他們解決問題。集體輔導、小組輔導、個別輔導之外，我還利用課間休息時間或偶然相遇時間和他們談話。學生們也儘量利用這些時間發問，或請我听他們的發音對不對。這種接觸完全有助於課堂教學。如果有較多的人都反映某一個問題，那就會成為我集體輔導的內容或實習課上的重點。

（8）鼓舞興趣

語言科學的教學容易陷於枯燥。教師在教學中遭遇困難時也極容易焦躁不耐，對學生的練習，否定的過多，肯定的太少。學生的積極情緒常因此銳減。我在这段教學中努力克服了這些毛病，對於每一個同學都給以相當的鼓舞。如有人怕羞，不願當眾發音。我研究他的心理，是怕發出的不南不北的怪音，引人發笑。我就指出他在某次個別輔導時某幾個音發的很好。這時他的信心增加，就不再怕人了。

最後總括一句：正音的教學，首要是教學法。教師要把正音的對象——學生方音的實際情況放在第一位，然後進行有效的指導。如果輕忽這個，只把一套課程內容講來講去，那就會連這一點點效果都沒有。

漢語規範化對兄弟民族學習

漢語的重要意義

——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的發言——

吳 昌

我們祖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漢語在國內不僅有五億五千萬以上漢族人民使用它，而且三千五百萬以上的兄弟民族為了達到交流思想、互相了解，以建設我們共同的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也需要學習並掌握漢語。隨着祖國建設事業的加速發展，這一需要就越發感到迫切。

幾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由於我們的語言工作者和專家們的不斷努力，漢語科學有了較大的發展，而漢語本身也由於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空前發展，走上了更加豐富和日益統一的道路。毫無疑問，這種語言的自然發展速度已遠遠不能適應祖國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需要。方言、方音雜處，古今詞、音並存，口頭語和書面語相差懸殊，這些現象必然給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額外的困難，給我們的事業招致莫大的損失。受到這種困難和損失的不只是漢民族自己，各兄弟民族因此而遭到的苦痛也是不可忽視的。

我願意在這次會議上簡單地介紹一下兄弟民族地區學習漢語的情況。

延邊朝鮮族自治區，解放後，在黨的正確民族政策領導下已經是一個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朝鮮族的學齡兒童將近百分之九十五都進入了學校。延邊五縣共有中等學校將近四十所（其中絕大部分是朝鮮族），大學一所。每年都為國家培養出幾千個中等和高等人材。但是由於不能很好地掌握漢語，就使這一支巨大力量的發揮受到很大的局限。延邊黨委和自治區政府對此已經引起了非常的注意，並且用了很大的力量來解決這個問題。幾年以來，延邊所有朝鮮族學校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就學習漢語，高中漢語課的教學時數竟超過了朝鮮語的教學時數，到了大學，仍然要學二年漢語。從小學五年到大學二年的十年學程中，漢語始終是一門重要的課程。固然，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遺憾得很，漢語教學效果始終不大，問題始終沒有徹底解決。

造成上面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科學

和教學體系上，教師的數量和質量上都存在着不少的問題，其中有一項比較重要的原因，就是前面談過的漢語在發展過程中帶來的那些缺點給漢語教學增加許多困難。

漢語的繁雜現象——詞彙的分歧、語法的兼收並蓄、文字的艱難繁瑣、語音的不能統一等，都影響着漢語教學的順利進行，其中最感困難的是語音的分歧。因此，我只簡單地敘述一下在兄弟民族中進行漢語語音教學的情況。

對兄弟民族進行漢語教學，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標準音問題。今天，漢語標準音是什麼，在理論上還有一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我們實際教學所依據的只能是“以首都語作標準”的字典標音。事實上，字典並沒有給我們徹底地解決問題，而且往往給我們帶來更多的麻煩。比如：“掉頭”的“掉”的音有 cào 和 xiào ，“秘密”的“秘”的音有 mì 和 mǐ ，“蛋殼”的“殼”有 ké 、 gě 和 uē 等音，“昏水”的“昏”有 hū 、 hū 和 hū 等音，至於“嫩綠色”不知道是念“ zǎo lǜ sè ”呢，還是念“ zǎo lǜ sè ”？“卡路里”是“ wǎ lù lǐ ”，還是“ wǎ lù lǐ ”？

我們要學生注意四聲，因為漢語的聲調是詞的構成成分。但是學生常常問道：“擁護”是“ yōng hù ”還是“ yōng hù ”，“突然”是“ tū rán ”還是“ tū rán ”，“菠菜”是“ bō cài ”還是“ bō cài ”？

這種模稜兩可的標音在字典中並不是個別現象。這必須加以整理、改善。

兄弟民族學習漢語必須通過書面記載的語言，而漢語的口頭語和書面語的差度之大，在語音方面也表現得特別突出。比如漢字的說話音和讀書音的不同已經是我們熟知的問題了。在漢族學校中如果說影響還不致太大，在兄弟民族學校中卻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因為教師們不能同時告訴學生一個字的幾種不同念法，並且使學生能永遠清楚地把它們區別開來使用。

實際教學中所遇到的問題還不止於此。在同一教

研組內往往由於教師語音的不一致而引起爭論。東北音和北京音雖然相近，却也存在着不少的差異。例如：

匹(東北)ㄒㄧ(北京)ㄒǐ 室(東北)ㄕ(北京)ㄕ

亂(東北)ㄌㄨㄢ(北京)ㄌㄨㄢˋ 宿(東北)ㄊㄩ(北京)ㄊㄩˋ

漢語的標準音既然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那麼，從因地制宜的觀點來看，以東北音教學的主張自然也就無可非議了。

我們兄弟民族的兒童和青年付出了很大的時間和精力，但所學到的漢語語音却始終徘徊在字典音、教員音、標準音、地方音、說話音、讀書音的南腔北調之間。這種混亂的現象使學生苦惱萬分。有些學生說：漢語的語音根本沒有標準，說錯了也沒啥，大致差不多就可以听懂。因此不重視語音練習，甚至放棄了語音學習。有些學生說：漢語的語音太複雜，教師都搞不清，我們怎能學得好，因此漢語根本就不易學好，對學習漢語失去了信心。至於教師方面，既然無法強求統一，也只好“馬馬虎虎，任其自然”了。

這樣，結果是非常糟糕的。學過七八年漢語的學生，對大部分的漢字只能用朝鮮語中的“漢讀”音（大體近似閩南方言）來讀。因為平素漢語教學中缺少語音訓練，違反了外語教學的原則，以致影響了學生對漢語的全面切實掌握。以上所談的只是語音方面的問題，至於語法、詞彙的混亂現象給漢語教學所帶來的影響，這裏就不多談了。我可以舉兩件事說明這一結果。

延邊大學的畢業學生被統一分配到祖國所需要的各個地方去工作。在瀋陽朝鮮中學工作中的同學來信說：“我現在最苦惱的就是漢語問題……有一次我參加了市教育局主辦的教學經驗交流會議，我雖然準備了比較充分的材料參加了這個會，但是開會不到十分鐘，我懊悔地跑回來了。因為他們的話我听不懂，

我又一句話也說不清。……我希望今後的漢語教學要特別注意語音，要從會話開始……”

延大醫學院的畢業生被分配到各個重要的工業部門，去時興高采烈，其中很多人不過半年就紛紛要求調回延邊工作。病人的話，自己聽不懂，自己的話，病人搞不通，他們說漢語實在太難學了。

大學畢業生的情況如此，中學生的情況就不言而喻了。

作為一個語言教學工作者，作為一個對兄弟民族教學漢語的工作者，我衷心地擁護漢語規範化工作的開展。目前漢語的複雜情況，在漢族之間儘管聽懂的程度有高有低，總之都還可以融會貫通，類推附會，而對於旁的民族來說，在他還不能用漢語進行獨立思維的時期，必須一是一，二是二，一清二楚，語言現象之間不可以有一點模糊和遷就。這樣，就非常需要一個統一的標準，因此，漢語規範化的工作無疑地會給對兄弟民族的漢語教學提供重要的良好的條件，對漢語教學改革起着極大的推動作用。

我們知道，漢語規範化的工作是一件非常艱巨的工作。這裏需要大力的宣傳、示範性的實踐和廣泛而細緻的科學研究工作。我完全同意報告中所提出的原則和辦法，並且願意在語言科學機關和專家的領導下，加強學習，為推行這一工作負起自己的光榮任務。我再說一遍，因為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巨大工作將會給我們民族文化生活的提高，給我們民族大家庭的內部團結，給我們的偉大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極大的貢獻。

最後，我希望由於我這不夠全面、不夠充實的發言，在漢語規範化的進程中，能引起我們的專家們和一切語言工作者對這一個新的問題給以應有的注意。

電影、話劇演員們要担起漢語 規範化工作中的重任

——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書面發言——

吳 青

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明確地指明：“為了加強漢民族的政治、經濟的統一，為了充分發揮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交際作用，從而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能更加順利地進行，為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促進民

族文化的高漲，為了使漢語拼音文字的實施準備條件，以至為了有效地發展民族間和國際間的聯系和團結工作，都必須使漢民族共同語即普通話的規範進一步明確起來。”這響亮的號召體現了我國全體人民在進行輝

煌的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一項迫切要求。

漢語規範化工作將要展開一個轟轟烈烈的熱潮。在這人民殷切期待的工作中，電影演員和話劇演員被光榮地稱為“推行漢語規範化的宣傳家”。為什麼把這光榮的稱號給予電影演員和話劇演員呢？這是值得所有的電影演員和話劇演員切實地深思的。

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為最高創作原則的我們的電影、話劇是進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工具，是廣大人民寶貴的精神食糧。人們喜愛它。據1954年的統計，電影觀眾已達八億二千多萬觀眾人次；話劇則在全國各地活躍着。電影、話劇中許多英雄形象以及各種各樣典型的人物常常經久不忘地活在人們心中。人們從這裏吸取着精神的滋養。而電影、話劇的主題，人物的思想、情感是通過人物的動作與語言傳達給觀眾的。《蘇聯文學史》談到這問題時說：“藝術作品的藝術性……它首先是由那些在作品中提出的生活問題的意義決定。作品中觸及的問題對人愈重要，它們就會激動愈多的讀者，就愈逼使他們考慮生活。但是這些問題對讀者說來僅在那個時候獲得意義，就是當它們體現在活人的情感和體驗中的時候。這些活人，讀者能夠想像得到，他們的生活，讀者能夠用來同自己的私人經驗相比較。如果不轉變為生活的語言，那麼作者所提出的問題，無論它們多麼的有意義，仍然不會全部傳到讀者的腦海和心坎裏的。”由此可以看到電影、話劇的語言將會對觀眾起到多麼深刻的影響，它將會使觀眾不自覺地吸收在生活中。越是成功的作品就越會是這樣。何況現在我國許多地區的人們都迫切地要求學習以北京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他們將都要以電影、話劇為學習普通話的可靠的難得的老師。這樣，就是說電影、話劇在漢語規範化工作中的責任是重大的，應該為祖國的人民創造出典範的台詞來。當然這樣典範台詞的創造，是編劇、導演、演員共同努力而成的。這裏我只想談談電影、話劇演員在漢語規範化工作中應當注意的和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

演員是動作的大師。這包括着形體動作與語言動作。劇作者所創作的台詞無論多麼生動、豐富，都必須經過演員的勞動把它有聲有色地體現出來。這首先當然要求演員對主題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在語言方面演員必須對劇本中對白或台詞的結構、修辭等方面具有正確的而又有創造性的認識。在演出中有時會遇到這樣的情形：演員把對白或台詞的標點說錯，語氣說錯，甚至意思弄錯。有的沒有說錯，卻不能把劇作者希望通過台詞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表達出來。這種情況說明，演員不但要提高政治修養水平與藝術修養水平，

而且在語言修養方面也要具備一定的基礎。

目前在電影、話劇演員中存在着一個比較普遍的問題，就是語音的不純正。大家都知道，為有助於推行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普通話，演員的語音就非要純正不可。這是語言的首要條件。演員被稱為“推行漢語規範化的宣傳家”，原因也就在此。但是，電影、話劇演員對這重大任務的重視是很不夠的，對漢語規範化本身的認識也是很不足的，甚至是完全不理解的。因此，演員雖然經常在緊張地進行着各種學習與鍛鍊，而在語音問題上卻沒有得到根本的轉變。

有些演員能兢兢業業地鍛鍊，也進行語言技巧的鍛鍊。他們知道對白或台詞是電影、話劇的重要的組成部分，演員要是不能把作品的思想內容，把所有的內心體驗用語言準確地表達出來，就不能算是個好演員。他們知道對白或台詞在電影或話劇中好像旋律在音樂中一樣，要準確、充沛而有美感，可是對語音的問題卻認為沒有多大關係。他們不願在語音問題上分去自己的注意力，造成“額外的負擔”，認為用自己的地方口音也無不可。當然這樣的演員就不能成為普通話的宣傳家。在演出中因地方口音使觀眾不懂或誤解所造成的損失更是無法估計的了。

有些演員對自己的地方口音也感到很成問題，但是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口音不好改了。這是由於他們對語音的科學性缺乏認識，對發音器官的生理結構缺乏認識的緣故。我們知道，任何語音都不是亂七八糟的，都有相當嚴整的語音系統的。我們可以分析語音構成的音素、每個音素在字中的地位、各音素彼此的配合、兩音相接的變化、輕重音的分別等而認識語音構成的規律。認識北京音的語音規律，再找出自己地方音的語音規律，找出兩種語音的差別和它的規律，這樣就能抓住自己語音問題的關鍵所在，從而可以得到根本解決語音問題的門徑。再從發音器官的特點來說，糾正語音也是可能的。唇、舌及整個面部肌肉都是如意肌，都是可以訓練使發音動作準確而發出標準音的。絕大多數演員對發音器官沒有作過必要的訓練，使糾正語音造成困難。有些演員自小受到封建家庭的束縛，說話要文雅，嘴不許大動。久而久之，舌、唇、顎及整個面部肌肉特別不靈活。這是由於封建意識束縛而造成，當然也能經過有意識地鍛鍊使它解放。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曾對演員說過：“為了正確地發音，必須對舌、唇、顎及整個面部肌肉加以正確的訓練。”所以，必須對改正語音的可能性作科學的理解。必須掌握科學的方法，不然，即或存心改正，也不會得到很好的效果。

還有些演員，對自己的方音感到很成問題要求急

現代漢語規範問題

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緊接着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之後，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集，於1955年10月25日至31日在北京開會。出席會議的有北京和其他各地的語言研究工作者、語言教學工作者以及文學、翻譯、戲劇、電影、曲藝、廣播、新聞、出版、速記工作者的代表共126人。參加會議的還有蘇聯、波蘭、羅馬尼亞、朝鮮的語言學家7人。會議聽取了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培、副所長呂叔湘作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的報告，並就這個報告裏所提出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大家對於漢語規範化的重要性，對於完成這一任務的方法和步驟，都有了明確的認識，一致認為這次會議的召開是及時的，會議是成功的。

會議認為：為了充分地發揮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交際作用，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能更加順利地進行，為了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的水平，為了給漢語拼音文字的實施準備條件，以及為了有效地發展民族間和國際間的聯繫和團結，都必須使漢民族共同語即普通話的規範進一步明確起來。會議經過討論，對於普通話和規範化的涵義都得到了一致的認識：普通話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是符合漢語的實際情況和歷史發展的。規範化並不是限制語言的發展，而是根據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把語言在其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一些分歧適當地加以整理，引導它向更加完善的方向加速發展。

會議認為：只有進行廣泛深入的科學研究，才能把規範化的工作做好。確定普通話的語音規範是目前首要的工作，必須迅速進行研究，使普通話的使用和教學有更正確的依據。同時，為了使我們的文學語言更加正確、精密、純潔、健康，現代漢語語法和詞彙的科學研究工作也必須大力開展。在即將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普通話的情況下，方言調查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漢語史的研究對於規範化的工作有指導作用，也應該予以充分的注意。語言教學必須放在科學的基礎上，這方面也需要進行研究。這一切研究都必須在馬克思主義語言理論的指導下進行，才能有良好的效果。我國的語言學工作者過去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為了更好地完成當前的任務，還必須加倍努力。

會議認為：由於我國語言研究工作基礎較差，現在面臨艱鉅的任務，必須發掘潛在的力量，培養新生的力量。在高等學校學生中，在中小學教師中，在各界人士中，有志於語言研究的人是很多的，必須鼓勵他們，幫助他們進行工作，熱誠地對待他們的研究

於改正。但是，改正語音不是很簡易的，在改正過程中會遇到一些困難，如對單字已能克服，但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排練或演出中，自己的地方音又出現了。於是就產生急躁情緒，對改正語音產生懷疑，甚至悲觀失望。這是不應該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忠告演員說：“我們應該像小孩子一樣重新學說話。”這對有方音的演員說尤其是這樣。要把經過許多年而形成下意識的發音動作糾正過來，絕不是旦夕之功，而是應該像“小孩子一樣重新學說話。”這種學習肯定是艱苦的。我們

在普通話學習中，對糾正語音固然應該看到它困難的一面，但是決不能被困難嚇倒；只要有毅力，有恆心，就一定能成功。

有不少劇作者認為劇中事件發生在哪个地區，最好就用哪个地區的方言，這樣才能真實、生動。我們知道，《春風吹到諾敏河》就是用東北方言寫成的。不少導演、演員也認為應當這樣來創作。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電影、話劇劇本是為演給全國的人民看的，這就需要用普通話寫。不然，對白或台詞寫得多麼動人，觀

題 學 術 會 議 決 議

成果。同時，為了更好地發揮現有的科學研究力量，必須加強團結，有計劃地分工合作，充分地貫徹人盡其才的原則，保證科學工作者有進行科學研究的條件。

會議認為：漢語規範化必須獲得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合作，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各級學校的教師、作家、翻譯工作者、廣播工作者、戲劇電影工作者，在普通話的推廣上有過很大的功勞，今後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地推廣普通話的情況下，必須加強語言的規範化，以期發揮更大的作用。

會議決定提出下列的具體建議：

1. 建議中國科學院聘請專家若干人，組成普通話審音委員會，研究並確定普通話常用詞彙的語音。委員會應於一年內編成《普通話常用詞正音詞彙》。委員會可以接受廣播電台和電影、戲劇部門的諮詢，幫助解決正音上的問題。

2. 建議中國科學院會同有關部門聘請專家五人至七人，組成詞典計劃委員會。委員會的任務是：(1)調查現有辭書機構的人員、資料和工作情況，作出合理改組的建議；(2)擬訂《現代漢語詞典》的詳細編纂計劃；(3)擬訂其他種類的詞典的計劃要點，並作出由何處負責編輯的建議。委員會應於六個月內向中國科學院和有關部門提出報告。

3. 建議中國科學院、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迅速共同擬訂在兩年內完成漢語方言初步普查的計劃。擬訂計劃時應該考慮到如何統一計劃，分區進行，如何訓練調查人員，並且應該考慮到此次普查以幫助推廣普通話為目的，調查方法務求簡便易行。為了適應目前的急迫需要，建議各省市大學和師範學院，在現有的條件下，在1956年暑假以前編出所在地區學習普通話的手冊。

4. 建議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各高等學校以及各高等學校相互間加強語言研究工作上的聯繫，經常交換資料，交換關於研究工作的報道，由語言研究所彙編通訊。

5. 建議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各高等學校語文系科、各語文雜誌社，通過報告會、討論會、座談會、研究小組等方式，把各地的語言工作者和有志於語言研究的人組織起來，有計劃地進行工作。

6. 建議各出版社、雜誌社、報社、以及廣播、戲劇、電影部門加強稿件在語言方面的審查工作，並且在讀者、觀眾和聽眾中廣泛進行漢語規範化的宣傳工作。

我們深信，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動員全國人民的力量，漢語規範化的事業一定能夠取得勝利。我們保證盡自己最大的力量為實現漢語規範化而奮鬥。

不懂也是枉然。而演員在處理對白或台詞時，有些演員認為用某地的方言才能突出特定的角色性格，如用山東話表現人物的倔強、豪爽的性格。這也是不正確的。表現人物性格首先在於表現人物的思想情感，而不在於用什麼地方的方言。我們看翻譯片，雖然把外國話改成漢語，我們一樣可以被人物所感染、感動而受到教育。如果整個電影或話劇的演員都用北京音的普通話，而單獨一個演員用地方音，不但失去和諧感，而且會使許多觀眾不能了解內容而造成損失。當然，

普通話現在並不是已有明確的規範，它還在形成中。它還要吸收許多方言中生動的、優美的部分，才能不斷的逐漸的豐富，這就需要演員在普通話和方言的正確關係上作恰當的掌握。

電影、話劇演員對祖國所寄予的這樣重大的期望是應當鼓起最大的熱情承當起來的。漢語規範工作不只是少數語言學專家的事情，也是所有的人民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而通力合作的事業中的一環。所以電影、話劇演員決不能辜負這時代所賦予的光榮的任務。

翻譯工作中的漢語規範化問題

——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的發言——

董 秋 斯

我現在談一談翻譯工作中的漢語規範化問題。

翻譯界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平時不大有機會廣泛地交換意見。我過去有一個時期，由於工作的關係，同國內一些翻譯家有过若干接觸。但是那個時期並不很長，因而接觸的範圍很狹窄，工作也很不深入。因此我的發言既不能反映翻譯界的具体情况，也不能表達翻譯界的共同要求。我只能談一談我个人的一點体会和感想，在座有好多位是翻譯界的老前輩，我有說得不对的地方，請加指正。

兩千年來，翻譯工作一方面豐富了漢語，使漢語的語法更加精密，對漢語是有一定貢獻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翻譯工作也有一些地方阻礙了漢語的規範化，甚至起了一些破壞作用。

翻譯工作中的缺點，責任當然由翻譯工作者來負。但是，我們不能不想到，缺點的造成是有其客觀原因的。那就是，翻譯與寫作不同：寫作是寫自己的話，翻譯是寫別人的話。寫別人的話，在詞彙和語法方面，都比寫自己的話受着更大的限制，幾乎沒有多少選擇的自由。而這個別人又是外國人，他們的語法與我們的很不相同。如要把別人的意思和風格表達得好，也就是要忠實於原作，就不免要遷就原文的語法，於是就發生了外國化（歐化，日化等）的問題。吸收外國語法，並非絕對不可以，有時甚至是必要的，但若超過了一定的範圍，就要起破壞作用了。

隨着我國人民社會生活的發展，漢語規範化是一種自然趨勢。因此，兩千年來，翻譯工作上不斷地出現反規範化作用，也不斷地受到限制。有不計其數的外國語詞和語法，通過翻譯工作介紹進來，但是由於長久不能吸收，就不知不覺地淘汰掉了。一千多年前的所謂直譯的佛經，以及五四以來的所謂直譯的文學書（實際上是死譯），到現在都很难找到了。

過去有不少翻譯工作者，把上述的情形看作正常的自然現象，認為沒有干涉的必要。在今天看起來，那種看法當然是有問題的。不過，在過去的社会制度下，那也是無可厚非的。因為過去的文化事業，只是少數人專有的，就是有一些偏差，影響也不大。況且，在封

建制度和帝國主義的割據局面下，漢語規範化根本無法談起。我們今天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簡單地來說，我們今天要動員六萬萬人同心協力地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有一個共同的語言作動員的工具。沒有這個工具，我們就不能徹底地普遍地動員起來，在建設工作中也要發生很大的困難。因此，我們要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就要排除一切障礙來進行漢語規範化。翻譯工作中的障礙，也必須加以排除。那就是說，我們要在翻譯工作中用合乎規範的口語，並且在詞彙和語法方面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分歧。

專就理論講，不同的意見似乎不會很多。我不相信現在還有人公然主張絕對用文言或方言來翻譯一般人閱讀的書籍或主張無限制地採用外國語法。同時也不會有公然主張絕對不准吸收古代的和外來的優良語法。不過，理論上沒有分歧，並不等於實踐中沒有問題。我們在實際翻譯工作中所遭遇的問題還是很多的，有的甚至引起爭論，惹起糾紛，而得不到適當的解決。這就是我們主張漢語規範化時候應當正視的問題。

提到解決“譯語統一”的問題，我認為光是公布幾條規則是不夠的。最近有人（例如《俄文教學》的同志們）討論翻譯標準問題，是信、達、雅，還是別的什麼。這種討論當然是有意義的，不過也使我想起一百多年以前英國泰特勒的故事。泰特勒的《翻譯的原則》出版以後，有一位教師提出抗議，說那幾條原則是抄襲了他的。泰特勒回答說，那幾條原則是天經地義的，表明人同心，心同此理。不過他那本書的主要好處不是那幾條原則，而是說明那些原則的例證。沒有充分的證明，那些原則就很可能變成空話。現在在會議上通過幾條原則是很容易的，因為大家對漢語規範化這個大方向是會持異議的，但是要想使這幾條原則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作用，光是在會議中舉一舉手，那是不夠的，必須在會後作一些切實的工作。

為了解決翻譯中的語言問題，我願提出以下兩點意見，供會議和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參考：

一、譯語不能統一，主要地反映了翻譯界的分散狀態：壞的作風受不到及時的批判，好的經驗不能廣

地交流。各出版社和編輯部雖然都做了一些工作，都有了一定的經驗，但都是枝枝節節的，未經過全面的調查研究，無法做出適當的總結，也就無法加以推行。例如，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積累了不少經驗，但是“只供內部參考”，對全國翻譯界的影響還不夠大。其他的編譯單位大致也是這樣。因此，要想做好這一項工作，必須有一些人就古今翻譯界不同科目、不同語文作廣泛地調查研究，並將研究結果在一個專門的定期刊物上發表，提出具體例證，展開討論，取得一致的意見，然後加以推行。各編譯單位的優良經驗也得以在這個刊物上互相切磋，彼此交流。

二、要使翻譯口語化和譯語統一，必須先有一部口語化的和譯語統一的詞典。詞典是一切翻譯工作者不能離手的工具。翻譯書中的詞彙以至語法，或多或少，都是從詞典裏抄來的。詞典中的註解不正確，必然影響翻譯書的質量，對於初學翻譯者尤其是這樣。目前翻譯工作者最感痛苦的就是沒有一部好詞典。過去有一

大部分翻譯書是從英文本譯出來的。英漢詞典的種類也比較多，可是，直到現在，還是沒有一部比較好的英漢詞典可用。一般翻譯工作者用得最多的是商務印書館的《綜合英漢大詞典》。這部詞典是抄襲了日本人的，註解中夾雜有許多莫名其妙的日本名詞，如“條懸木”之類，而且大部分註解都是文言的。語文修養好的譯者，可以多費一番事，把那些文言註解和外國語法翻譯成通用的口語。這在多數譯者做起來是比較困難的，多半是照原樣抄上去完事。這樣一來，翻譯書中的語言就無法規範化了。這部詞典用得這末廣，這末久，有它的優點，就是例句比較多，適合東方人的需要。但是若就它破壞口語化和規範化來說，它的罪名可也不小。譯文中許多不文不白、不中不西的詞句，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由它販賣的。解放後出版了鄭易里先生的《英華大詞典》，在口語化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但是用今天的標準來要求，還是很不夠的。英文方面是這樣，別的語文方面當然更要差了。

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在北京勝利召開

今年在北京召開的第三個語言科學的學術性會議——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在12月6日至15日勝利地舉行了。這次會議是由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學院共同召開的。出席討論會的有：民族語文科學工作者、有關省的民族事務委員會、教育廳、各地民族學院和自治區、自治州以及有關的出版社、民族語文研究機構的負責人 and 代表，共160多人。

在12月6日的開幕式中，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劉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稼夫、國務院文教總顧問馬里采夫、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學院顧問謝爾久琴柯以及中央各文教科部門和各高等學校的代表都參加了會議。

會議首先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潘梓年致開幕詞。他說：這次舉行的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是要了解民族語言工作情況，交流民族語文工作經驗，交換意見，討論如何幫助少數民族創造、改進和改革文字的工作，以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事業。接着吳玉章主任講話。他首先肯定了我國民族語文科學工作者幾年來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所做出的民族語文工作的成績，接着說，在各少數民族地區也已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高潮當中，為了發展合作化和民族學校教育以及幫助少數民族學習漢語漢文，都需要加緊進行幫助各民族創立、改進和改革文字。這是一件廣泛的羣眾性工作，是一項很艱鉅而迫切的任務，各有關文教部門和各民族領袖人物和知識分子都應該同民族語文科學工作者一道參加這一工作。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少數民族語文研究組主任傅懋勳在大会上作了《幫助少數民族創立、改進和改革文字工作的情況和問題》的報告，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副主任馬學良和該院預科副主任盧念蘇也作了關於中央民族學院語文教學情況和經驗等方面的報告。

第二日，蘇聯顧問謝爾久琴柯教授作了《蘇聯創立文字和建立標準語的經驗》的報告，在大会上接着提出的報告還有：李鴻範：《民族出版社在翻譯工作中發展和使用新詞彙的情況》，陳士林：《新彝文實驗教學的情況》，傅懋勳、刀世勳：《雲南省傣文改進的問題》，布·哈·托達葉娃：《有關中國蒙古語族語言和方言的研究問題》，蒙古語族語言和方言調查隊：《蒙古語族語言和方言調查彙報》，馬學良、喻世長、王輔世：《苗語方言調查報告》，袁家驊、羅光：《選擇僮族標準語基礎方言的經過》，新疆民族語言調查隊：《新疆民族語言調查彙報》等。教育部林礪儒副部長和高等教育部曾昭掄副部長介紹了有關民族教育的情況，並提出問題，作了指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主任劉格平也到会作了指示。在閉幕前一日，由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劉春和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分別就會議中提出的行政和科學研究兩方面的問題作了講話。在15日的閉幕式上，胡乔木同志到会作了重講話。（本刊編輯部）

关于詞典的选詞工作

——在現代汉语規範問題学术會議上的发言——

孫崇义

选詞工作是詞典編纂的基本工作，在今天，更可以說是漢語規範化工作在詞彙方面的具体表現。現在先介紹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在這方面的一些情况，然後提出在工作中得到的一些体会和接觸到的一些問題，來向大家請教。

首先要提到的是《國語詞典》（1937—1945年出版，1948年重版）。《國語詞典》是“國語運動”的產物，是一部在當時做了一些新的嘗試的詞典。它在當時要作為“中國語文普通單詞、複詞或習用成語的總彙”（本書黎序），所以收詞範圍是今古新舊兼收並蓄的，總量約十萬條。它在选詞上做的工作，我們可分兩項來談：

（一）判斷什麼是一個“詞”什麼不是一個詞，這本來是語法學者不容易徹底解決的問題，但是作為一個詞典工作者，因為工作上的要求，對此可總得有個決定的態度，否則，他就無從組織起一部詞典來。《國語詞典》對於單音詞的选取，大体還承襲着過去一般字書，再加上了新的解釋；對於複音詞就不能不費些斟酌了。當時大致是拿能不能獨立運用，能不能作一個意義單位來做取舍標準的。一些動賓結構、動補結構的詞，結合得太自由的都未收，例如“打人”“打狗”不收而“打把式”“打靶”收；“打死”“打傷”不收而“打倒”收。對一般向心結構的詞大体都是如此處理的。

（二）開始著錄了以前詞書從未著錄的北京口頭語詞。根據的資料以清末民初的北京白話報刊、白話小說為主，還有一大部分是編輯同人隨時採錄的日常生活裏的口頭語詞。這種辦法，好處是紀錄了活生生的語詞，缺點是沒有系統，不夠全面；而且所記的難免有通行面狹窄的北京土話。總括《國語詞典》的选詞工作是蒐集得較廣，但缺乏科學的計劃，所以多而有漏，編輯時又未能做精密分析，所以各詞的時差、地差等等都沒有做詳細的交代。

在《國語詞典》之後，大辭典處編的是幾部字典，但是我們在字典工作中是向詞本位的方向去努力的，比方《學文化字典》的注解就不拿一个个漢字做本位。例

如“瘡”字注“瘡子……”，“瘡”字注“瘡癤……”這標誌着一般趨勢，新華辭書社的《新華字典》更進一步地標誌了這種趨勢，羅常培先生和呂叔湘先生的報告裏已經提到。還有《簡明字彙》的舉例，《同音字典》的語彙目的不同，但都關係着选詞工作，都紀錄了“現在通行的詞彙”。

本年度我們的主要工作是試編一個《現代漢語通用詞彙長編》（初步底稿），預定年內完成。這個工作為《現代漢語通用詞彙》（《現代漢語詞典》的基本詞目）蒐集資料，打基礎的。它的定詞標準大致在語音上是否成為一個起訖的段落，在語法上看是否能做一個意義單位，總起來說還是看它是否能獨立運用。另外把作為詞根而構詞能力很高的詞素，比較有獨立意義的詞組、成語，也暫為列入，問題較多的作為附例。詞範圍是：說北京話的人口頭常說的，報刊上常見的，有廣大讀者的權威著作和文藝作品上常用的，重要法令文告上應用的。其中有必要和一般語詞作區別的，分別標注，如（文）、（成）、（科）、（方）、（包括北京土語）等，以備在下一步選擇工作中做參考。

一部現代漢語詞典將包括現代漢語文學語言中的所有語詞，它最後的去取要經過周密審慎的選擇過程。在這以前必須廣泛地全面地蒐集、調查，我們的工作還是初步的嘗試。

從過去工作中，我們有下面幾點体会和一些問題拿來和大家商榷：

（一）為了準備編一部《現代漢語詞典》而從事的工作，首先要突破方塊字的局限，樹立起從語言出發的詞本位觀念。過去一般詞典的組織單位，仍是一個個的方塊漢字。為了確切地紀錄活的漢語語詞，為給拼音文字打下底子，我們必須編一部以“詞”做組織單位的詞典。收在這部詞典裏的必須是在漢語裏能獨立運用的詞。比方說把“人民”作為“詞”來收，“民”只為構成“民主”、“民用”、“農民”、“牧民”的詞素，把“木”了”的“木”當做詞來收，而“木箱”“木器”“榆木

(二)漢語詞彙是非常豐富的，從語言出發更可以明確“豐富”的實際意義。寫在紙上是同樣幾個漢字，在語言裏因為聲音的細微變化，可分化為不同的詞。“小人”讀作 $\text{ТИ} \check{\text{З}} \cdot \text{ОУ}$ 和讀作 $\text{ТИ} \check{\text{З}} \text{О} \text{Э} \text{Л}$ 是兩個不同的詞。“這家子 ($\text{Ш} \check{\text{Э}} \text{И} \text{У} \cdot \text{Р}$)”、“這家兒 ($\text{Ш} \check{\text{Э}} \text{И} \text{У} \text{Л}$)”表現着不同的感情。……這些都不是方塊漢字所能表示出來的，而詞彙蒐集者卻應當“慎思明辨”的。

(三)我們要現實地認清現代漢語的實質，又要發
展地注意它和過去的联系。現代漢語由古代漢語“推
陳”而“出新”，它承繼着過去而不是同過去割斷的。現
代漢語的學術新詞大半按文言的構詞規律造成，這自
然因為在現階段我們用的文字還是方塊漢字，另一面
也未必是因為文言的構詞方式凝固性較大，正像現代
科學上專名術語至今多用拉丁文。例如在現代語言裏
我們用“沒”來表示“不存在”，而“無縫鋼管”並不叫“沒
縫鋼管”；“鋸樹”、“鋸木頭”是現代語，林業上用的可是
“伐木場”、“伐木工作”。這種現象在規範化工作上應取
什麼態度，這是應該注意的。

(四)現代漢語有不少的外來語詞，其中大部分已和漢語融合成一体。对此我們提出兩個問題：第一，過去外語音譯有許多是照閩廣語的音值譯過來的，北方人和原文對照，往往莫名其妙。今後希望科學院對此作一決定(已通行的譯名不必改)。第二，漢語語法和外語語法，不一定完全對應。在外語是個“詞”，翻到漢語裏也許成為“詞組”，比如“集體農莊”“五年計劃”在英文都是詞，在漢語裏都成為“詞組”，選詞時對此應考慮如何處理。

(五)現代漢語的文學語言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大部分的語詞當然來自北方話。但是現代漢語的另一源泉是五四以來的新文藝，而那時的作品並不完全拿方言作基礎，其中有大部分繼承着舊詩詞曲的文學語言(辭章)。“雲兒”“月兒”之類今天還時常在書面上出現，究應如何處理？再則，戲曲、說書等由特殊規律構成的語詞，在現代漢語裏應佔什麼地位？

另外還有許多和語音學、語法學交叉的問題，像輕重音、兒化、詞類等，這裏不多談。

總之，我們在選詞方面，雖然由於工作上的必要，接觸了一些問題，也試想解決一些問題，但缺乏理論指導，一直是“暗中摸索”。如果說有些許經驗，也沒有作科學的總結。以上提出的不過是這個問題的發端，希望引出大家的寶貴意見，解決一些困難問題，給將來的詞典編輯工作打好基礎。

1955年10月30日，《中國語文》和《語文學習》兩個雜誌社在北京聯合舉行了一次座談會，招待出席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的各地代表。出席的有：吳文祺、胡裕樹、李振麟、張為綱、陳必恆、傅銘第、孫常敘、吳昌、馬雍、趙天吏、關興三、殷煥先、顧正、韓允符、楊春霖、薛聲震、彭鐸、趙輔英、劉又辛、張士一、黃綺、高慶賜、宛敏灝、沙少海、程世本、方仁麒、劉遲等和兩雜誌社負責人韋戢、葉聖陶、林漢達、辛安亭、吳伯簫、張志公等。

会上，章懋、林漢達、葉聖陶、張志公先後報告了兩個雜誌社的簡單情況以後，各代表對兩個雜誌提了一些積極的建議。張為綱、陳必恆、傅銘第、孫常敘、胡裕樹、李振麟、吳昌、關興三、劉又辛等相繼發言，表示兩雜誌對他們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願意熱烈支持它們。有人認為《中國語文》和《語文學習》應該明確分工，比如《中國語文》可以以高等學校的教師為對象，而《語文學習》以中等學校的教師為主要對象。對於《中國語文》，他們要求展開不同意見的爭論，但同時也應該指出總的方向，不要使讀者如墮五里霧中，無所適從。《中國語文》過去和各地的聯繫也是不夠的。對於《語文學習》，要求根據漢語教學和文學教學的內容和學習者的需要，多發表一些幫助教學和幫助學習的肯定性的東西，不必多討論問題。此外，代表們還指出，兩個雜誌的思想性、指導性和通聯工作，都還需要加強。在兩雜誌社負責同志提出請大家協助寫稿時，代表們一致表示這是應盡的義務，願意盡力去做。他們還建議兩個雜誌社可以跟各學校的有關教研組建立聯繫。

最後，韋慤社長詳盡地敘述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最近的工作情況和文字改革方針。

(本刊編輯部)

近几年來苏联东方学研究中的 漢語形态問題

(1950—1955)

郭路特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苏联漢学家对中國科学家在全面研究漢語方面所進行的那些富有成效的工作非常留心。中國的語言科学已經得到了很多的成績並正在大踏步地前進着，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熱烈地擁護中國語言学家所開始的確立漢語規範的工作。除去中國語言学家、偉大的中國人民的代表之外，沒有人能完成目前擺在研究漢語的語言学家面前的那些重大任务。

中國同志們認為，編寫漢語規範性的語法是現在中國語言学家面前的一項十分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我們完全同意這一點。中國同志所說漢語的形态跟印歐語的形态大大不同，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極其重要。

因此，也不能不同意这样一个論點：為了編寫科学的描寫語法，首先要研究漢語發展的內部規律，研究漢語的特點。必須研究漢語結構中的個別問題，弄清漢語語法範疇的特點，弄清表現這些語法範疇的形式標誌的特點。

已經出版的中國科学家的著作和討論詞類問題的材料証明：中國語言学家在这方面已經做了很多工作。

我們很注意要最大限度地估計到中國科学家的所有指示和意見。中國語言学家对自己的語言的見解是對我們苏联漢学家的一种不可估計的帮助。

在我們这个報告中，我們只想非常簡要地向中國同志談一談我們在漢語形态方面所研究的幾個問題，並真誠地請同志們提出所有自己的見解和意見。

最近幾年，關於漢語形态学和造句法的問題，在莫斯科舉行過一系列的論文答辯。其中，有關漢語形态問題的論文有这样一些：B.M. 宋采夫的《詞和詞根的問題》，H.B. 宋采娃的《被動式》，C.E. 雅宏托夫的《現代漢語的動詞》，T.H. 札道揚柯的《結果動詞》，B.A. 帕那秀克的《語氣動詞》。A.M. 儲卡諾夫的《帶“了”的動詞格式》，這篇論文的研究工作已完成。

此外，目前還有幾個研究生正在研究这样一些形态方面的題目，如《副詞》、《劃分形容詞的標準》、《性質形容詞》、《詞的界限》。

研究漢語造句法問題的論文有这样一些，如B. Γ. 穆德洛夫的《漢語中比較的表示法》，H. Γ. 拉寧斯卡婭

的《帶助詞“把”的賓語的倒裝》，H.H. 恰波金那的《後詞》，A. Φ. 郭托娃的《疑問句》，M.K. 陸棉切夫的《主句子句》，Ю. В. 洛日傑斯文斯基的《助詞“的”字的研究》正在研究的造句法方面的題目有：《地方狀語》、《名謂語句》、《判斷句》等等。

以上這些著作的共同的特點是：想劃清形态學現象和造句法現象的界線，規定所研究的那些現象的性質以及它們在語言系統中的地位。

但是，以後的研究工作和不止一次的討論証明：以上那些著作的作者所下的很多結論不能認為是已得証實的和無可爭論的。我們的工作實踐令人心服地証明：普通語言學的理論不能不考慮漢語的特點，而硬在漢語上。漢語語法結構的特點，這個問題目前成我們同志們注意的中心。

我們在研究工作中主要注意研究漢語形态的問題，這是因為，我們認為漢語形态是漢語語法結構中一個最複雜最困難的方面。漢語的特殊性在形态方面表現得特別鮮明。

正確地解決形态學的問題對研究造句法現象也其重要。依我們看，形态學問題研究得不够，這就不在某種程度上影響造句法問題的解決。

從中國曾舉行的詞類問題討論當中可以看出：在第一個應當仔細全面研究的問題就是關於漢語中的語法性質問題。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歸結於漢語詞有無用形式標誌來表達的語法意義的問題。換句話說，這是有關基本語法範疇和附加語法範疇，以及它在詞裏如何表現的問題。和這個問題密切聯系的是这样一个問題：漢語詞類的所謂附加範疇是不是可有無的。

一般地來說，什麼是語法範疇呢？我們的理解語法範疇是一個概括意義和它的形式表現的統一。詞裏也就是在形态學研究的對象裏能找出什麼語法範疇呢？我們可以找出最一般的所謂“基本範疇”，這就是詞類。此外，還可以找出範圍比較小的範疇，就是各個詞類所特有的所謂“附加範疇”。

首先，我們來談談基本語法範疇——詞類的特點。

語法範疇表示概括了的意义。然而，並不是所有概括了的意义都是語法意义。

概括了的意义，只有在下面的情況下，才能算是語法意义：表示它的詞在說話当中在用法上和其他範疇的詞不同；一个詞究竟屬於哪一範疇，要看这个詞在表能附加的語法意义時能有哪些形式標誌，要看它怎样同詞組和句子中的其他詞联結。

表達某一种概括意义的詞是不是一个詞類，要看有無上述的那些表現手段。

苏联漢学家的意見認為漢語的詞具有一系列的形式標誌，这些標誌使我們可以肯定地说：漢語的詞能表達一定語法範疇的意义，至少是表達一般的語法範疇——詞類——的意义。

在我們的著作裏研究着这样一些詞類的形式標誌，如（一）詞類的句法功能（这就是所有詞類固有的特點）。（二）有構詞法作用的詞尾（許多名詞、副詞所固有的特點）。（三）不同詞類的構詞模型。（四）实詞和構形成分的結合，这种構形成分或是做实詞之內的接尾，或是不在实詞之內，但無論如何，它們不改变詞的詞彙意义，而只是給詞加上一種附加的語法意义（不同的詞類能够有不同的附加意义）。

結合着上面這一點，我們認為還必須談談下面這一問題：

我們覺得，明確詞的形态這一概念是方法學上的重要問題。顯然，把形态了解為詞形变化的形式（狹義上所講的，即变格和变位），對漢語來說是不適用的。苏联語言學（謝爾巴、維諾格拉多夫的著作）對形态有一種不同的、比較廣泛的了解。

形态不僅有綜合的，而且還有分析的——這個說法是大家所知道的。

構成形态的綜合手段和分析手段不同，但是，不管是前者或是後者，在本質上都有很多共同的特點。

不論是綜合的還是分析的手段都不能獨立使用，只有和其他語言成分結合在一起時（它們和這些成分組成一個語法上的整體），它們才有意义。

不論是綜合的還是分析的都有这样一些特點：同某些類詞結合，沒有具體的詞彙內容，表達一個概括了的語法概念。

不論是綜合的還是分析的都表達詞的基本意义之外的附加意义。這裏也正是分析的形态手段和句法的動詞不同的地方：助詞有一定的詞彙意义，並且不表達詞的基本意义之外的附加意义。

因此，形态可以从廣義上來了解，即形态不僅可以由綜合手段構成，而且也可由分析手段構成。靠綜合

和分析的形式而產生的詞的变化，叫做構形法（форм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詞的形态——是形态學上的形式標誌，但是，除去形态學上的形式標誌之外，還應估計到造句法的形式標誌，根據謝爾巴、維諾格拉多夫等許多科學家的意見，它們都可作劃分詞類的標準。

漢語中詞的物質外殼的变化（至少是某些類詞的变化）沒有形成新詞，而只是形成同一個詞的不同形式。對這種現象的探討使人可以把漢語的詞看作是它的各種形式的系統。大家知道，詞素“了”、“着”、“過”^①都沒有獨立的詞彙意义，在句子裏不能獨立運用，在語音上融合在它們所從屬的那個詞裏。當它們和实詞（動詞）結合時，便給這個实詞加上了一種附加的語法意义（這些詞素中的每一個都能給实詞加上一種特殊的語法意义）。比如，“吃”同這些詞素的結合（“吃了”、“吃着”、“吃過”）沒有改變“吃”這個詞的詞彙意义，也沒有形成新的詞。“吃”、“吃了”、“吃過”和“吃着”的詞彙意义都還是一個，只是多了一個附加的語法意义（各種体的意义），因此“吃”、“吃了”、“吃過”、“吃着”，不是不同的詞，而只是同一動詞的語法變体。

由於“吃”字沒有詞尾而能表達一定的附加的語法意义（有些科學家認為是未完成体，另一些科學家是普通体的意义），而這種語法意义正是用不加詞尾的方式來表示，所以中國科學家和苏联漢學家都曾做了这样一种假定：“吃”和“吃了”、“吃着”等形态比較起來，也是一種形态，所不同的只是它以“零形态”的形式出現。

“零形态”這個概念是在普通語言學裏產生的。中國語言學家俞敏也使用了這個術語（請看他在1954年第4期《語文學習》上發表的《關於漢語動詞的形态》一文）。這個概念在高名凱教授近來發表的幾篇文章裏也提到過（見《中國語文》第16期），但是高名凱教授認為這個概念是不適用於漢語的。1946年，郭路特的副博士論文也曾把這個概念應用在漢語上。詞是形态的系統和統一體，這個概念是在苏联語言學裏產生的，特別在謝爾巴和維諾格拉多夫的著述裏，这样應用。

我們的一個漢學家宋采夫曾把詞是形态的系統這個定义應用在漢語上，並進行了詞的結構分析和分立詞幹的嘗試。這個嘗試有多大成效，將來才能看出。大家知道，在印歐語裏，詞幹就是詞的不变化的部分，表示形态变化的部分不算在內。詞幹在同一個詞的所有形式裏都有。為了要分立出詞幹，就必須去掉有變

^①看來，應當把做動詞的“過”和作詞素的“過”區別開來，前者是有实詞意义的，後者則是沒有具體的詞彙意义，而且通常是讀成輕音。

化的部分。

宋采夫在分析動詞“吃”字的語法變體時，分立出了“吃”字的詞幹，這個詞幹在語音上與“零形態”相符合，跟“零形態”不同的是沒有“零形態”的標誌和附加的語法意義（未完成體或是普通體）。

因此，他打算把有語法形態的“吃”（“零形態”）同作詞幹的“吃”分開。在說話當中運用的不是詞幹，而是詞（有詞尾的或者是零形態的）。漢語的零形態，同時也是詞在詞彙中的形式，也就是說，用來代表它的一切形態並收進詞典裏的那個形式。

詞幹既然是由屬於某一詞類的一個詞的各種不同形式中抽出來的東西，因而詞幹是同一定詞類的意義相聯系着的。所以作者認為詞幹也可以分類，如動詞詞幹、名詞詞幹、性質詞詞幹。

漢學家在解決漢語詞類問題時所經常碰到的一个基本困難，就在於許多詞和許多類的詞能夠“跨類”。

宋采夫根據詞是各種形態的統一體（當然也根據詞是一些句法標誌的總合和統一體）這一論點，作了一次試驗：從語法上來論證作名詞的“鋸”跟作動詞的“鋸”，作名詞的“組織”跟作動詞的“組織”，作名詞的“代表”跟作動詞的“代表”，作動詞的“討論”跟作名詞的“討論”，在漢語裏，各是屬於不同詞類的兩個詞②。

這種說法是從以下幾點來論證的：

以上每一組的每一個詞都有自己一套形態和一套句法標誌。比如，當動詞用的“鋸”字只不過是一個動詞的“零形態”，除了這個“零形態”之外，它還有許多其他形態：“鋸了”，“鋸着”。而當名詞用的“鋸”字就不可能有這些形態。從語音面貌上看，作動詞的“鋸”和作名詞的“鋸”在詞彙的形式上彼此沒有區別。但是，由於作動詞的“鋸”還有“鋸着”等形態，所以可以認為作動詞的“鋸”字跟作名詞的“鋸”字在物質上是有區別的。比如，我們可以拿“鋸着”和作名詞的“鋸”來比一比，就可以看出：物質上的差別是存在的。從此作者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是兩個不同的詞。如果把它們看作各種形態的系統，馬上就可以看出，它們在物質上是有所區別的。它們只在一個形式上是相符的，那就在詞彙形式上。

作名詞的“代表”和作動詞的“代表”兩個詞的情形也是這樣的。作名詞的“代表”還有“代表們”這樣一個形式。而作動詞的“代表”，則有“代表着”這樣的形式。如果我們把“代表們”和“代表着”來比較一下，那麼，它們的物質差別是顯而易見的。

作者作出這樣的結論：以上的每一對詞不是同時屬於不同詞類的一個詞，而是屬於不同詞類的不同的

詞。我們舉的那些例子正是相應的名詞和動詞。

語言學裏認為這是構詞法上的一種現象，稱作是類。在這裏，構詞手段就是各種不同的形態的系統。

甚麼東西連結着那些語法上各不相同的成對的呢？根據作者的意見，作名詞的“鋸”和作動詞的“鋸”這一對詞是由一個共同的詞根“鋸”連結着的，這個詞根也包括在名詞裏也包括在動詞裏。詞根只是作一個共同的語音和意義的綜合體包括在不同範疇的裏，因而它不是直接和詞類的意義聯系着的。換句話說，詞根連結着各種詞類。類似的情形我們還可以從“胖”（形容詞）和“胖子”（名詞）一類的例子裏看到。這種情形下，詞根連結着語法上不同的詞。但是，共同的詞根當然也可能存在於屬於同一範疇的詞裏。比如“黨”（名詞）和“党性”（也是名詞）就有着共同的詞根“黨”。在這個簡短的敘述裏，不可能把所有的論據都舉出來以論證上述觀點。

但是，這種觀點還要仔細審查，因為這種觀點是這樣一個沒有經過證明的假設出發的：漢語的詞必有形態，這就是說，句中的詞至少有一種由形態表達附加的語法意義。上面所做的分析沒有充分估計到這樣一些有很多爭論的理論問題，如：（一）漢語中接詞的實質和用接詞表達的那些意義的性質；（二）附加範疇是否是可有可無的問題。

用“零形態”表達附加的語法意義的問題，還有許多爭論。“形態系統”這個概念在應用到漢語上時，應該根據上列爭論問題的解決方式的不同加以訂正。

我們覺得，下面的詞類問題，可以認為是已經弄明白了。

（一）判斷語言中某些詞類是否存在，不是只根據幾種形態，而是要根據某一類詞所特有的全部形式標誌。

（二）在確定某一組詞是屬於哪一類時，所有的形式標誌要同時用做準則。

（三）一種詞類之內的某些組詞在形式標誌上可有些不同（在一個詞類之內形成小類）。

（四）在語言中有任何一種用形式標誌來表現的詞類時，有些詞雖然不充分具有它的形式標誌，但它們可屬於這個詞類，因為這些詞的一般意義和該詞類意義和句法特點是相同的。

（五）當同一個語音綜合體在句子中不僅有各種同詞類的概括意義和形式標誌，而且還有詞彙意義化時，例如，“組織”（動詞）和“組織”（名詞），“武裝”（

②轉類的現象沒有排斥這樣的可能性：在任何一定的下文裏，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把甲詞類用作乙詞類，但是甲詞類並不因此就變成乙詞類。

動)和“武裝”(動詞),在這種情況下,在我們面前的不是一個詞,而是兩個不同的詞(兩個同音異義詞),這是毫無疑義的。

附加的語法範疇和基本範疇(詞類)比較起來,是一種比較小的局部的範疇。

這些語法範疇也是概括意義和它的形式標誌的統一體。這種局部的語法範疇的語法意義附加在某一類的詞的意義上面,而它們的形式標誌則是用詞的各種形態(綜合的或分析的)來表達。

各種不同的詞類可能有各種各樣的附加的語法範疇。例如漢語裏一般可以分立出這樣一些最無爭辯的範疇,如用來表示名詞多數的範疇,這個範疇是由名詞後面加詞尾“們”的方法來表達;又如動詞體的範疇(或動詞體時態範疇)是由動詞後面加詞尾“了、過、着”的方法來表達。這些,上邊已經都談過。

在和加詞尾的動詞的語法意義對照之下,不帶詞尾的動詞的語法意義表現為一種未完成體(普通體),它的形式標誌是沒有詞尾,也就是“零形態”。

但是,所有這一切不是像我們從前想像的那樣簡單。在研究附加範疇時,我們遇到了兩個困難。第一個困難在於這些範疇的形態表現的特點。

一般被看作是表現附加範疇的手段(構形手段),從其結構來看,它們通常是一些同實詞詞素和單音詞有類似的語音綜合體(的確,有時是弱化了了的)。有些時候,它們(例如,詞素“過”)和那些把它們派生出來的實詞詞素同時存在有相關性。用來構形的形態成分既能和它所屬的那個詞連在一起(就是說,好像成為它的一個成員),也能用其他詞把它們隔開。這些成分甚至能與幾個並排的同類的詞同時發生一種附加的語法意義,好像是作為一個整個詞組的“形態成分”。我們認為,在研究漢語附加範疇問題上的第一個困難,就在於這個構形手段的特點。所有這一切都使確立漢語某語法詞素的性質問題,極其難於解決,因此也就需要深入研究和充分照顧漢語形態成分的特點。

宋采娃在她的論文裏,對於照顧構形手段的特點作了某些嘗試。

作者在這篇論文裏想證明:在有“被”字的被動式句子裏,“被”字是不可缺少的成分,沒有它,動作的客體就不能扮演主語的角色。“被”這個助詞指出:動作是從主語發生,相反地,是朝向主語的,“被”字的語法作用在於:它能指出那些表示動詞的主體和客體的詞在語法關係上有什麼變化。“被”字的省略能改變詞之間的語法關係,把被動句變為主動句。這樣看來,“被”字能給動詞帶來一種附加的語法意義。

作者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這種被動式結構像一般語言中的語態形式,譬如說:像俄語中的語態形式。

下面分析一下“被”字有無具體的詞彙意義的問題。從研究各個時代文獻當中看出:在13世紀,“被”字就已經語法化了,並在使用上不受詞彙意義限制了。

助詞“被”字大多是使用在有生物作主語的句子裏。這種現象是漢語在其全部發展時期所特有的。按照作者的意見,由於這個特性,因而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在動詞的動作是表達一種“不愉快的”情形時,才使用“被”字。

“被”字既然表達一定的語法意義(即改變動詞的語法意義),並沒有詞彙意義,那末“被”字可以看作是構成形態的手段。但是,這種手段具有某些特徵。

從研究材料當中看出,“被”字既不是助動詞(沒有動詞的形態和功能),又不是前置詞(前置詞不能改變動詞的語法意義——它們只和名詞相聯系),也不是詞頭(在“被”字位於動詞前面的那種主謂句裏,它可以被狀語隔開,“被”字也能同時作為兩個動詞的形態成分——以上這些都說明了它的獨立性。

作者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被”字是一個特殊的助詞,它和動詞聯用,組成一種複合的格式,這種格式稱為分析的形式。

漢語附加範疇問題上的第二個困難在於:一般人都說,這些範疇是可有可無的,也就是說,由詞的某種形態所表達的意義也可以用別的手段來表達,在一個句子裏如果沒有詞的一定的形態成分,也可以由造句法手段、詞彙手段、上下文(其中包括現實的)等等來代替,例如“學生們來了”這句話裏,主語的多數是由加名詞詞尾來表達的,但不這樣說,也可以說成“學生都來了”(主語的多數由助詞“都”來表達)或者可以簡單地說成“學生來了”(假如預先知道要來的學生不是一個而是好幾個的話)。

再舉一個例子:“他來了”這句話,這裏完成體是由動詞詞尾“了”來表達的,但在一定的條件下還可以說成,“他已經來了”。這裏由於使用了副詞“已經”,過去動作的完成就一目了然了,動詞本身並沒有加詞尾,也就是說,它是以未完成體(或普通體)的形式出現。

漢語的詞,在它的詞彙形式上,至少在很多情況下,或是沒有任何附加的語法意義(如“學生”可以表示一個學生或學生們,也就是說,等於“詞幹”,或是有某些廣泛的附加的語法意義(例如“他來”這句話裏的“來”,由於是零形態,所以還包含附加的所謂普通體的意義),然而這種附加的語法意義在一定條件下,受着上下文造句法和詞彙等因素的影響,很容易被排斥掉

(比較:“他已經來”,這裏的“來”所表示的動作,正如副詞“已經”所指出的,在說話之前已經完成了)。

大家知道馬伯樂將這種情況同印歐語的情況比較了一下,他見到在印歐語之中附加的語法範疇是必然存在的,並且不可能想像一個詞可以沒有它的某種附加的語法範疇,然而在漢語不是這樣,因此他得到了下列結論:附加的語法範疇不可能是可有可無的。漢語的範疇既然是可有可無的,可見得,漢語中根本沒有那些附加在詞類上的語法範疇。馬伯樂以同樣方法應用了另外一個印歐語言學的“大前提”,即詞類只是在有附加語法範疇的條件下才能分立出來,因而他又得出了第二個結論:漢語是沒有詞類的。

因此,研究這些附加的語法範疇是否是可有可無的問題,這對研究漢語語法有重大意義。對這個問題,個別的蘇聯漢學家曾進行了一些研究。宋采娃的著作就接觸到語法形式是否是可有可無這個問題。

所有那些沒有加上被動式形式標誌的動詞,在和加“被”字的動詞相比,顯然可以看作是主動式的動詞。由於在某些結構中,那種沒有加上被動式形式標誌的動詞很明顯地不表示主動式的內容,因而宋采娃的那部著作對此結構都作了分析,並作了這樣的結論:在有些句子裏,一個體詞,雖然是放在句子開頭兒的地方,但它仍然不是主語,而是賓語,因此;由動詞所表示的動作不是朝向主語,而是照舊朝向賓語,而在另外一些句子裏,動詞所表達的不是一種由發動者產生的動作,而只是一種主體所處的狀況(“土匪消滅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它已經不是一種動詞句了,而只是一個特種句,宋采娃管它叫做狀況句。

這樣一來,宋采娃根據動詞的一個附加語法範疇的材料論證這種範疇是必要的,只要動作是朝向那個當句中主語用的客體,也就是說,只要是一種被動結構,就必須有它;這樣,她也就推翻了馬伯樂那種說法:說什麼漢語的附加語法範疇是可有可無的。作者的這種說法是以漢語的詞一定有形態標誌這樣一個論點作根據的,它並且沒有適當地照顧到漢語語法手段問題的複雜性。上述的那個論點既然未必可以認為是已經証實了的,那麼宋采娃關於漢語有被動式的這個結論也仍然是論證得不够。

附加範疇是否是可有可無這個問題在洛日傑斯文斯基和儲卡諾夫的學位論文中也提出了。大家知道,“的”這個字在有些修飾性的詞組中可以省略。有些科學家認為“的”字表達修飾性的意義。然而,修飾性的意義也可以不用“的”字表達。

洛日傑斯文斯基認為,這裏問題在於:詞序的語法

意義——修飾性——不正確地伸延到了“的”字上,而這個“的”字只不過是用在修飾性的詞組中,它本身能表達修飾性的意義。在這種情況下“的”字是用來表達另一種語法範疇,即限定修飾語。洛日傑斯文斯基提出這樣一種假定:說漢語虛字是可有可無的那一點是因誤解而產生的。如果某一虛字能夠省略,而我們給這個虛字所加的意義又依然存在,那麼這個虛字的語法意義是規定得不正確的,需要補充研究弄清它的真面目。因此,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假定:在有某一語法意義存在的地方,必須一律使用表達那個意義的虛字,這就是衡量某一虛字的語法意義規定得是否正確的標準之一。

儲卡諾夫的著作根據研究“了”字的材料,對解附加範疇是否是可有可無的問題提出了稍有不同的看法。儲卡諾夫在研究材料的總結中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一)“了”字表示“完成體”:它是一種特殊的時範疇,既表示動作完結又表示動作屬於過去時間。

(二)同樣的現實內容也可以在動詞為零形態的詞句子中表示出來。按照儲卡諾夫說,這樣的內容在句子中,是藉助詞彙手段、句法結構和上下文來表達的。

(三)然而,不能從這裏作出這樣的結論:選擇某種語言手段是絕對無理由的。有許多條件決定它們這樣或那樣使用。弄清究竟強調句子的哪一個成分——這是所有條件中的最主要的一個。這樣看來,儲卡諾夫的學位論文裏實際上提出的是有關語言中的同義手段和為什麼使用不同語言手段的問題。“了”等於零形態+相應的語法和意義的上下文。

不同語言手段相互交替的問題現在還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

以上這就是莫斯科的漢學家近來所研究的幾個有關漢語形態學的問題。這就是我們對一些漢語形態學問題的初步結論。

能够在這裏同諸位,同研究漢語的最強大的科學隊伍交換意見,我們覺得很榮幸,正如中國諺語所說:我們這是“拋磚引玉”。我們的看法並不是什麼無可辯的定論,這些,還需要从各方面來考慮和仔細審查。我們莫斯科的漢學家請求中國朋友們在這方面幫助我們。我們認為最好的幫助形式是嚴厲的和嚴肅的批評。

斯大林同志講過:“如果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有自由的批評,任何科學都是不可能發展、不可能進步的”。最廣泛地交換意見,這就是為順利發展漢語語法科學所必需的。

如果我們微不足道的勞動對中國語言學家有幫助的話,即使是極少的幫助,那我們將非常高兴。

(劉湧泉、吳樂、陳鵬、阮西湖譯)

在語言科學的研究中 體現了深厚的兄弟般的友誼

——記兄弟國家語言學者最近在我國的學術活動——

蘇聯漢學家鄂山蔭(И. М. Ошанин)教授,郭路特(Н. Н. Коротков)教授和波蘭漢學家夏伯龍(Witold Jablonski)教授,赫邁萊夫斯基(Janusz Chmielewski)教授應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邀請,參加了本年10月10日到31日召開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這四位專家除了參加會議,還先後在北京作了學術報告、訪問和談話,已於11月11日回國。羅馬尼亞科學代表團團員、語言學家格拉烏爾(A. Graur)院士9月20日到北京,在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師範大學,作了三次學術報告,參加了幾個座談會,還出席了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共計到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武漢和廣州參觀訪問,共作了五次學術報告,參加了四個座談會,11月18日回京,27日回國。這五位兄弟國家語言學專家的遠道來訪,毫無疑問,大大地增加了科學研究在國際間的合作,同時也給中國語言學工作者帶來了無限的鼓舞,它的意義是很大的,所以把他們的學術活動做一個綜合報道是完全必要的。

10月27日,蘇聯的鄂山蔭教授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做了《關於文學語言規範化的幾個問題》的發言(全文見上手本刊)。10月29日,蘇聯郭路特教授在會上介紹了蘇聯漢學研究漢語的情況並批評了資產階級學者伯樂認為漢語沒有法範疇的荒謬理

11月2日上午,鄂山蔭教授和郭路特教授到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參觀,下午鄂山蔭教授同語言研究所第三組全體研究人員就詞彙問題進行了座談,郭路特教授同呂叔湘副所長就漢語語法問題交換了意見。鄂山蔭教授對於如何辨認漢語“複音詞”的問題,做了系統的論述。他認為確定漢語的複音詞,應該把詞義、音和形態結合起來看,同時還要考慮到詞的歷史演變。郭路特教授指出,蘇聯漢學家過去從狹隘的形態觀點研究漢語語法,後來發現這種方法對於漢語是完全適合的。另外並討論了漢語語法上的一些具體問題。11月3日,郭路特教授在北京大學作學術報告,題目是《近幾年來(1950—1955)蘇聯東方學研究中的語形態問題》(見本期本刊30—34頁)。11月8日



貴賓們在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自左起:赫邁萊夫斯基教授,郭路特教授,鄂山蔭教授,呂叔湘副所長,夏伯龍教授) (趙銓攝)

上午,鄂山蔭教授和郭路特教授到北京大學了解了外國留學生學習漢語的情況,下午到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同青年研究人員進行了座談。兩位教授對青年同志們提出的問題,一一作了回答。關於蘇聯科學院的工作經驗,鄂山蔭教授說:蘇聯科學院的工作是和各大學有關部

門緊密地聯繫着的,通過各種形式,如開座談會、交換資料等等,進行聯繫。否則,各自孤立地進行工作是做不好的。接着大家就蘇聯科學院培養研究生一事提出問題。鄂山蔭教授說:研究生都有導師,導師對研究生的論文要負責任。在進行論文答辯時,導師沒有發言權。郭路特教授補充說:從前研究生最後一年才寫論文,論文寫成初稿交給導師看,由導師提出批評。現在改變了辦法:研究生在第一、二年從事學習的時候,就進行一些研究工作,收集與論文有關的材料,試寫短論,送給導師審閱。導師不作正面修改,只指出缺點,提出詰問,說明哪些材料是有問題的,哪些說法是可靠的,讓研究生自己再深入鑽研,進行修改。這樣便能逐漸培養研究生選擇材料,確定論斷的能力。等到最後

一年从事全部論文的編寫時，自能取精用宏，少犯錯誤。過去研究生的論文選題過於籠統龐大，短時期內不可能掌握全面材料，因而就難得出可靠的結論。近幾年來改從比較具體的小題入手，所得的結論比較可靠。但小題必須是同原則性問題有聯系的。研究時必須通過這個具體問題考慮到有關的原則性問題的解決。否則僅限於對具體問題的單純描寫，僅限於指出個別現象，那沒有什麼意義。導師在評判研究生的成就時，不能單以論文的結論為依據。有人文章寫得很漂亮，結論也平平穩穩，但從他研究的过程、處理材料的方法、發掘問題的深度等方面看來，覺得平庸、膚淺，这样的人未必有培養的前途。反之，論文的結論雖然不完全正確，但推論嚴密，考慮問題細緻深入，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可以看出寫論文的人是有研究能力的，这样的人倒一定有培養前途。在青年同志們問到詞和詞組的區別問題時，鄂山蔭教授說：這個問題，蘇聯語言學家到現在還沒有得出最後的結論。區別漢語詞和詞組也許更為困難。不過，有些我們一看就知道它是詞，有些一看就知道它不是詞，困難只在於中間的一部分。我們可以从各方面去考察，找出區別的標準，如果真有不能區別的中間部分，我們也只有承認它們有時是詞，有時不是詞，因為這是客觀事實。關於漢語主、賓語的問題，郭路特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主、賓語的決定不能全靠詞序，還要考慮其他條件。鄂山蔭教授接着說：問題不在於什麼是主語還是賓語，而在於怎樣解釋主、賓語，否則，是會爭論不休，永無結果的。最後，兩位教授表示歡迎中國青年語言學家多同他們通信聯系，經常交換意見。

格拉烏爾院士在9月26日參觀了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並同所內領導、高級研究人員進行了談話，談到有關方言調查、詞典編纂、漢語拼音文字的形式和聲調以及少數民族文字等問題。27日上午，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座談。參加座談的有該會主任吳玉章、副主任胡愈之、常務委員韋謏、秘書長葉籟士和副秘書長莊棟。院士談到簡化漢字、拼音文字和少數民族學習漢語是否容易等問題。10月6日，在北京大學報告《什麼是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報告指出：語言學不利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是無法向前推進的。但是僅僅在著作中彙集一些材料，簡單地證明一些語言的事實，那還遠不夠。只有研究一般性的問題，發現語言的內部發展規律，建立語言歷史和社會歷史之間的關係，才稱得起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

10月7日上午，院士參加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座談

會，到會的有該系語言學教授、講師等17人。談到語言與思維的問題時，院士說：語言與思維的統一性主要內容起着決定作用。思維是內容，是決定的因素。內容變了，形式也要變。思維可以同舊形式配合，但不能持久，內容終將突破舊形式而產生新形式。關於語法和邏輯的關係問題，院士說：邏輯研究思維的規律，語法研究語言的規律，兩者關係密切，但不是一回事。研究語法不能總用邏輯的方法來解釋，語法與邏輯之間有矛盾，解決這個矛盾，就是語言發展的結果。最後賓主雙方相互介紹了兩國大學中語言學教學的情況。



格拉烏爾院士和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專家們座談

(自左起：呂叔湘副所長，羅常培所長，甘世福先生，
格拉烏爾院士，吳曉鈴先生) (趙鈺攝)

10月8日，格拉烏爾院士在中國科學院作了《個別與一般——偶然與必然》的報告。這個報告嚴正地批判了資產階級語言學者強調個人在語言變化中的作用和認為在語言變化中個人毫不發生作用的兩種形而上學的說法。他說：我們重視必然，但並不否認偶然。在科學的指導下，人們可以促進由偶然轉化為必然的過程。在語言的詞彙（即把基本詞彙除開剩下來剩餘的詞）方面，個人的作用比較重要一些。新的語法構成法無非是由個人來的。這些新的語法構成法如果同語言的規範相符，就會為大家所接受而傳播開。因此，那種認為個人在語言中毫無作用和強調個人是語言的主宰的說法同樣是錯誤的。

報告以後，院士對於聽眾提出的問題分別做了答復：(1)問：語言無論是語音、語法都有體系，但有時有例外，對於“例外”的看法如何？答：語言形成自己的體系，有音系，有語法的體系，這些體系之間是互相影響着的。某一體系失去平衡的時候就影響別的體系，因此必須找到使它正常的辦法。體系的變化可能是由偶然的，必要的時候可能由偶然轉化為必然。(2)問：有時由於個人的作用會由偶然變為必然，這種說法上何與語言規範化聯繫起來？“有用”的原則是什麼？答：這是語言進步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語言是進步的。

發展的。“有用”標誌“進步”。進步的原因是受一
要性所約束的，思維經常變化，語言表達思想，進步的
內因在此。語法對語言起進步作用時，語法就是有用
的。(3)問：葉斯丕森語言學說的主要錯誤是什麼？答：
和認為語言的創造是為娛樂的，是由個人孤立地創造
法；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語言是由羣眾勞動及交際創
造的。帝國主義者希望我們失去自己的語言，所以葉
斯丕森要大家都學英語，這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10月10日下午，院士在師範大學報告《略論語言
史和社會史之間的關係》。這個報告對於斯大林的經
典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作了詳盡的闡發。
他說：語言中出現深刻變化的時期在任何地方都是和
社會出現重要變革的時期不相符合的，語言的變革有
先於一個掌握政權階級的被推翻，但是我們不能因
此否認社會結構的改變對語言所發生的影響。一切階
級並不是同時對於語言發生同樣的影響，而那些在上
層中的剝削階級，却比那些處於衰亡中的剝削階級在
更大的程度上給語言打上階級的烙印；至於無產階級，
只有在取得政權之後才有充分可能這樣做。

在北京的期間，院士還訪問了外國語學院、俄語學
院和中央民族學院。他到課堂上聽了課，並且和學院
的領導、教師進行了學術上的討論。外國語學院的沈
德鴻、郭迪誠教授曾和院士詳談了法語上的教學問題。

10月17日至20日，格拉烏爾院士到天津作了三
次學術報告，聽眾有南開大學、天津師範學院、河北師
範學院等校師生約千餘人。

10月25日至31日，院士出席現代漢語規範問題
學術會議。27日上午在大会上發言，題目是《關於單一
的民族語言》（全文見上期本刊）。

院士在南方的第一次學術報告會，11月9日在上
海華東師範大學舉行，出席者有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
學的師生，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協會會員等300多人。

第二次報告會11月14日在武漢華中師範學院舉行，
出席者有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學院、中南民族學院等校
師生800多人。

院士在南方參加的第一次學術座談會，11月3日
下午在南京大學舉行，由方光蕪教授主持，出席南京大
學及南京師範學院教師50多人。第二次座談會11月
10日下午，在上海中國科學院辦事處舉行，由陳望道教
授主持，出席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的教師及上海新
文字工作者協會會員等19人。第三次座談會11月14
日上午在武漢華中師範學院舉行，由高慶賜教授主
持，出席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學院、中南民族學院教師
進10人。第四次座談會11月17日下午在廣州中山大學

舉行，由王起教授主持，出席中山大學及華南師範學院
教師27人。

座談的內容很豐富，可分作兩方面：語言學專門問
題討論和語言學研究及教學情況的介紹。

討論的問題有：(1)歷史比較法的缺點。院士說：
歷史比較法是在資產階級上升階段提出的。本身是有
缺點的，因為它沒辦法恢復失蹤了的實際情況。我們比
較了斯拉夫、拉丁文等等，建立起印歐語系，恢復了一
些歐洲古文字，但無法知道恢復的是方言還是民族基
本語言。已有人努力補救這個缺陷。梅耶曾發現古歐洲
語有一部分是方言。另有一些語言學家如郭爾洛維奇
（波蘭）想彌補歷史比較法的另一缺陷，分析語言不同
時代的演變情況，已有局部成績。(2)漢語區分詞類
問題。區分詞類，漢語語言學家分成兩派，相持不下，
我個人對雙方的爭執很難說話。但是我相信漢語是有
詞類而且是很發達的。如果一種語言不能分別詞類，
那種語言就不能作為交際的工具，問題在有哪些詞
法。如“我”和“我們”有單數多數之別，很明顯，“們”不
能放在一切詞上。從這方面看，英文也沒有多大變化，
英文的形態變化比漢語多一點，比拉丁文可就貧乏得
多，不能因為它少就說它沒有詞法。資產階級語言學
家要把詞根從詞法中剔除出去是錯誤的，詞根是詞的
重要部分，也是詞法中的一部分。分析詞根的結構就
屬於詞法。是否可把漢語的詞根加以分析，我看是可
以的，漢語是有詞法的。(3)葉斯丕森主張按詞的功
能區分詞類，對批判這個問題，院士說：區分詞類只注
重內容或只注重形式，都是形式主義。首先要注意詞
的作用，但不能忽視詞形。只有唯心的語言學家才想
把形式拋在一邊不管。(4)德·索緒爾把語言與言語
分開的問題。院士說：德·索緒爾用唯心主義的觀點談
語言，把語言同言語割裂開，以為言語是個人的，語言
是大眾的，語言高於言語。照他說，言語是不必注意的。
他把語言看作抽象的，同物質無關的。實際上，語言因
許多人用它做交際工具而存在，不能把語言和言語分
開。至於研究作家語言時，兩者是否可以區別呢？依我
看來，不能因此把言語和語言分開，應該研究作家語言
中哪些是特別的，哪些是大眾所通用的。(5)有人問：
漢語拼音文字的設計，是否要照顧歷史，分尖團音？院
士答：只有語言學家才能研究古語。如用古語拼寫文
字，人民得先學會古語。人民說的是現代話，人民要
的是現代語音的文字。因此，創製拼音文字不應該強調
照顧歷史。此外，還回答了詞和仿語的界限，基本詞彙
的特徵，語言和思維產生的先後，民族是否必須有獨特
的語言，少數民族分散在各地區，如何幫助他們形成民

族共同語、音位是區別詞義的還是區別詞形的、語音教學中，音位分析與音素分析以哪一個為主等問題。

關於語言學情況的介紹，格拉烏爾院士說：羅馬尼亞語言學界過去受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影響很深，解放初期又受了馬爾庸俗唯物論的影響，引起混亂。1950年，斯大林的經典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發表後，我們才找到了正確的方向。這幾年來，已經編成五卷本《羅馬尼亞現代文學語言詞典》（已經出版了兩卷），兩卷本《羅馬尼亞語語法》。今後的工作，除了補充兩卷本語法、編纂羅俄、羅法、羅德、羅英、羅波等詞典外，主要的研究工作放在羅馬尼亞語言發展史跟普通語言學方面。關於方言研究，我們想編一本方言地圖，已進行20年。作家語言也研究了多年。還沒得到正確的結論。詞源學的研究、方言詞典和古代語言詞典的編纂，以後也要進行。

我國語文工作者如方光燾、陳望道、周有光、吳文祺、李振麟、張世祿、璞之珍、胡裕樹、許傑、劉銳、高慶賜、傅銘第、邵子風、嚴學窘、王起、樓棲、高華年、張為綱等在會上或會外介紹了我國南方各高等學校目前語言學研究及教學的情況。大家都表示，尤其在全國文字改革及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兩個會議以後，願意加緊學習兄弟國家的先進經驗，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下，努力完成中國語文工作者當前的偉大任務。

格爾烏爾院士曾參加編纂《羅馬尼亞現代文學語言詞典》的工作，有編詞典的豐富經驗。這次把印出的第一卷詞典送給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一部。從廣州回京以後，11月22日下午，語言研究所第三組鄭奠等5人特訪院士，討論有關詞典編纂的問題。下面是談話的主要內容。

(1)問：《羅馬尼亞現代文學語言詞典》是怎樣編纂的？答：這個詞典在羅馬尼亞解放前就開始編了，編輯由一人陸續增加到五六人，材料收集得不少；人民政權成立後，停止了舊的工作，組織新的委員會，改用新的觀點方法修訂。舊材料中好的部分都利用了，從翻譯的列寧、斯大林的經典著作中吸取了不少材料。實際上人民不喜歡用過多的翻譯的例子，有些很平淡的例子也不必從翻譯作品裏找。字義的排列，最先的意義排在前邊，引申的意義放在其次，再引申的意義順序排下去。如果把最常用的意義放在前邊，不常用的放在最後，這就和詞義的發展相違背了。引例也是這樣，如果把現代作家的例句放在前邊，時代較前的作家的放在後邊，這和歷史發展也是相違背的。這本詞典第一卷出版後，就有人批評所引的例證有些沒有多大意思，甚至是庸俗的，例如其中引了作家這樣的例句：“我今天

晚上洗了一次澡。”這種句子，編者可自造，不必引家的話，引起批評，是當然的。如果是作家語言中有特殊意義的詞句，那是可以引用的。

(2)問：選詞以書面語或以口語為標準？答：選詞以書面語為標準。羅馬尼亞口語同書面語的分別不大，言詞也不多，大作家在作品中使用一些，在《羅馬尼亞現代文學語言詞典》裏都可以查到。這部詞典是五卷的大型詞典，收詞上推到1800年，舉的例子，有到一世紀的，約有近5%的古詞，5%的方言詞。科學名詞和口語如果是一般人能懂的就收，只有少數人能懂的不收。

(3)問：詞典應以析義為主或以說明詞的用法為主？答：我認為解釋詞義是最主要的，每個詞都需要定義，先解釋詞義，再找例句，但是很普通的詞或意不必舉例句。

(4)問：詞典中應該怎樣釋義注音？答：一個詞如果是文學語言中的詞，就在詞條下注音、釋義、舉例。某詞的方言詞，也列為詞條，但不解釋意義和舉例，只明參見某詞條。科學名詞應先由科學家加以解釋，者把科學家的解釋通俗化了之後，交給科學家審閱，編入詞典。關於漢語詞典的注音，我以為用注音字母和拉丁字母相對照比較好。編詞典首先要考慮為本人用。漢語詞典注上國際音標，對於外國朋友的使用也不會很大。



蘇聯和波蘭的語言學者在北大學座談

（正面左起：夏伯龍教授，甘世福先生，王力先生，郭路特教授，鄂山蔭教授）

波蘭夏伯龍教授和赫邁萊夫斯基教授參加了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的大會和小組討論會。10月10日夏伯龍教授在大会上發言。題目是《關於漢語規範問題的一些看法》。他詳細地闡發了漢字改革問題和方言與漢語規範化的關係。他指出，漢字簡化和漢語規範問題是密切地聯繫著的。漢字簡化只是漢字改革的條件，只是漢字拼音化的第一步。在談到方言和

在規範化的關係時，他說：“誰也沒有想一下子把方言廢除掉，我們不是要廢止方言，而只是要豐富民族語言。”關於民族語言的發音問題，他指出：民族語言的發音的一致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正確的發音不應該人為地把它確定下來。為了建立一個規範化的發音，必須拿一種實際存在的和正常發展的方言做出發點。他認為：雖然有些方言區的人民的家鄉話同北京話相差很遠，但是只要認真地努力學習，是完全可以學會北京話的發音的。此外，夏伯龍教授在發言中還談到了方言和文學語言的關係問題，關於同義詞的處理問題和關於外來語的借詞問題。

赫邁萊夫斯基教授在大会上提出《關於漢語規範化問題的幾點意見》。他着重論述了有關漢語規範化的重要理論問題：(1)規範化的漢民族語言和文言之間的關係。(2)漢民族語言和現代方言之間的關係。在談到第一個問題時，他指出：規範化決不能了解為從活的口語中排除從文言裏借來的詞和成語，這些成分早已成為民族語言（包括書面的和口頭的）的一部分。並且規範化絕不排斥民族語言繼續借用文言成分，尤其是書面語言；當然這種借用要有個合理的範圍。他並且認為：“借用文言將要成為活的民族語言和過去文學傳統之間的寶貴的联系。”在談到第二個問題時，他指出：方言調查對漢語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目前必須強調徹底調查漢語方言的必要性。因為民族語言的規範化和中國語言的統一要加速民族語吸收方言的過程。此外，他還談到漢民族語言的形態學問題和“的”要不要分化的問題。

夏伯龍教授和赫邁萊夫斯基教授在11月2日參觀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並和所內研究人員進行座談。赫邁萊夫斯基教授用了較多的時間和吳曉鈴先生、金鵬先生以“喇叭”一詞的語源為例，深入討論詞尾“巴”的用法和意義。起初他懷疑“喇叭”是藏語的借詞，金鵬先生根據具體的文字和語言資料，證明“喇叭”是藏語

借詞的可能性不大。接着就談到了“喇叭”一詞的歷史發展問題，吳先生和金先生舉出“噴吶”一詞和“喇叭”的關係，“噴吶”是阿拉伯語的借詞。最早見於明代初期的書面語，這就牽涉到中國音樂史的問題。吳、金兩位先生向赫邁萊夫斯基教授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

夏伯龍教授和赫邁萊夫斯基教授在11日9日參觀了北京大學，並作學術報告。夏伯龍教授的報告是《談談翻譯問題》。由於時間的限制，他只講了所準備的報告中的一部分。他指出：翻譯工作者須具備三個條件：認識原文的語言，認識翻譯的語言，認識作品。他認為在翻譯工作中成語問題最為重要，它牽涉到詞彙、語音、語法等方面。翻譯要忠實於原文，但可以因譯的文體不同而有所差異。翻譯應該是原文要素和不同語言的要素的綜合產品。翻譯工作者在進行翻譯時，首先要分析原文，而後再用另一種語言手段把原文翻譯過來。最後他指出：翻譯應採用現代的語言。

赫邁萊夫斯基教授報告了《關於上古漢語裏的雙音詞問題》。他認為，上古漢語中純粹的雙音詞可分三類：①擬聲的詞（這類詞和分析語言的結構無關），②原來的帶複輔音的單音詞經過分裂而產生的單音詞，③以上二者之外的雙音詞（獸類、蟲類等名稱）。他分別對三類詞舉了許多例證，說明上古漢語的詞是單音節組成的。

各兄弟國家語言學者最近在我國各種學術活動中，提出很多寶貴的論述和意見，同我國語文工作者充分地交換了彼此的語言學研究和教學情況。這對於我們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展開有關漢語規範化的語言科學研究以及語言教學等工作有很大的啓發和推動的作用，對於今後加強兄弟國家的文化交流奠定了有利的基礎。我們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也對於我們兄弟國家語言學者的互助和合作的進一步發展，滿懷着信心。（何立）

對漢字改革和漢語規範化的反映

——讀者來件綜述——

10月下半月裏，教育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召開了“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了“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這兩個關係全國人民生活的會議的消息、文件在各報和本刊11月號上發表以後，本刊不斷收到各方面讀者來信來稿。大家都表示歡欣鼓舞，熱誠擁護；特別是對10月26

日《人民日報》上的《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而努力》的社論，都表示要從不同的崗位上在具體工作中來響應這一偉大號召。不少讀者——主要是語文工作者，都從本身多年使用語言文字的經驗，說明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漢語規範化的迫切需要，認為這是每個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政治任務，因為它

是社会主义建設中重要的一环。

讀者來稿中談到因語音隔閡而影响工作和學習的情况最多,这也就說明確定語音規範在推廣普通話当中是首要的工作。廈門大学中文系陈中西同志來稿指出南方各方言區學習普通話应注意的方法和步驟。哈爾濱外國語專科學校宋嗣喜同志反映說:“有一位南方籍工程師到北方一个工廠工作,由於語音不通,誰也听不懂他的話,為進行工作,他不得不藉助手勢和文字,後來廠方特意为他請了一位翻譯,才算解決問題。”電力工業部北京基本建設局電器工人關崇勳同志說:“在一次用長途電話催交貨物時,对方声称交貨14噸,我方誤听為40噸,因而造成空車罰款,浪費資金。”因此,他指出:“漢族人民目前以至今後,都必須有共同語音的普通話。這一工作對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具有極其偉大的意义。……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在積極推行上應該由語言學專家定出具体可行的步驟,由廣大羣眾逐步加以推廣。”南京電信學校劉佐令同志說他在參軍後碰到一个同學要同老大娘借菜盆而誤借了尿盆,因為“尿”和“要”不分,“要盆”變成“尿盆”,鬧出笑話。又說他到杭州時打听到錢江大橋的路,照普通話說成“錢江(41K)大橋”,當地羣眾都不懂,因為當地唸江為缸(《K》)。北京民族出版社實銘同志來信說:“文字改革與語音規範化是相輔而行的,拼音文字必須依靠統一的民族共同語,我們應該在進行語音規範化的同時,逐步把報刊書籍改成橫排,並尽量使用簡化的漢字。”

重慶西南師範學院劉揚烈同志來稿中談到:“漢字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已經成為我國文字改革的目标,而統一語音是文字改革中一个必經的重大步驟。語音不統一,要實現漢語拼音文字是很困難的。為了這個目的,就要求建立標準的統一語音,目前已有成熟的條件,是非常好的。我認為這次會議決定推廣以北方方言為基礎,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是完全正確的,適時的。”

江蘇省海門中學王惠冲同志來信說:“我們崇明、海門、啓東一帶都不大使用普通話,通行的是方言很重的崇明話;听廣播、看电影,都听不懂普通話。我們常常要求老師幫助我們學習普通話,但是老師說他自己還得慢慢學。這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通過的決議,使我們太高兴了,我們完全擁護這個決議並衷心感謝党和政府對我們的關懷。”

武漢大學易翔同志對推廣普通話的辦法,寄來建議說:(1)學生在社會活動中要全部使用普通話,(2)南下的北方幹部應該起推廣員的作用,(3)在學習說普通話時不要隨便類推,希望語文刊物多發表方音和北京音對應規律的材料。

從上面這些反映可以看出語音規範化工作的要求十分迫切,同時也反映了方音差別在工作、學習、生活

上所造成的種種困難,無形中給國家建設也帶來不少無謂的損失。

有些讀者從詞彙、語法的個別分歧現象說明漢語規範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各地人民對同一概念同一事物就有很多不同的名稱和說法是妨礙全民族的思想交流和交際的,因此必須規範化。有的讀者從書面語中使用普通話的要求,提出寫文章、尤其是文學作品,要糾正濫用方言土語的現象。例如,桂林周文謹同志的來稿中指出:“現在要求每一個寫作的人都不要濫用方言土語,這是完全正確的,十分必要的。我們完全擁護胡乔木同志在漢語規範會議上所說的:‘現在擴大方言影响的不是地方戲,而是一部分作家,他們喜歡用大量的方言寫作,這種作法對於民族文化的發展有阻礙的作用。’老舍先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表示決心要以‘少用土語方言’和‘選擇地運用土語’的實際行動來響應政府的號召,態度是誠懇的。我們相信所有作家都會同意這樣做。可是就在老舍先生這篇文章中還有我們南方人不好懂的字眼兒,如同‘管祖母奶奶……’的‘管’,我体会這個‘管’字等於我們說的‘把’字,可是我去問一位在北京念過兩年大學的老師,他也不敢肯定。”宋嗣喜同志來稿中,也指出這一點,他說:“由於作家在作品中使用了方言,使多數讀者很難懂得其中的對話和涵義,因而減低了文藝作品的教育效果。像《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兩部有名作品,很多南方人看不懂。”

有的讀者從科學術語的規範上來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如上海退休的老數學教師張筱樓同志來信說:“數學書裏的詞彙和語法有些地方不很妥當,像無法四邊形……在直線上,某數以上或以下等詞語,就很費解,初學者更難懂。其他科學書裏都有同樣情形。”

截至目前,所有讀者來信來稿,都是從本身崗位工作上的實際經驗,表明擁護漢語規範化的熱誠並願盡全力推廣普通話。中小學教師對這一措施更表示特別興奮鼓舞,認為要實現漢語規範化、推廣普通話,教師應該首先盡到自己的責任,不但要教好學生說、寫普通話,還要成為影響人民羣眾使用普通話的宣傳家。大家更從這兩個會議的文件中深深体会到這是同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不可分的政治任務。武漢華中師範學院附屬工農速成中學語文教師朱伯石同志來稿中指出,語文教師必須掃除一切思想障礙,大力擔當起推廣普通話的責任,爭取早日實現全面的漢語規範化。河北完縣東楊各莊完全小學教員龐安福同志來稿談到學習以北京音為標準音的必要性時曾提到,普通話以北京音為標準,應該注意聲調,做教師的首先應該掌握標準音的聲調,才能教學生說出正確的普通話。重慶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瞿時雨同志也來信指出了推廣普通話要注意教學聲調的必要。

从本刊讀者來信來稿中看出,《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而努力》的号召已經在語文工作者以至廣大羣眾中間掀起了普遍的熱情響應的高潮,一致表示願盡一分應盡的責任。不過,許多讀者指出,在推廣普通話當中要注意糾正並消除幾種不正確的想法和看法。除了極少數的人因有狹隘的地方觀念,在公共場所還堅持自己的家鄉話以外,更有一部分語文教師或羣眾認為多年用慣了家鄉話教學或交際,一旦改說普通話,有些不好意思。覺得學“京腔”,怕人

家笑話。正如關崇勳同志反映說:在非以北京音講話的地方,往往有些人鄉土觀念較深,對非本地話多加諷刺或排斥,對當地人講北京話(即使是南腔北調),更加非議,認為“出門沒幾天就學了京腔,連祖宗話都忘了。”這種看法必須糾正過來。這些現象也說明羣眾中還存在一些思想障礙,是需要宣傳教育才能打通的,因此也就要求語文工作者和一切知識分子都能以身作則地擔當起推廣普通話的直接教學和宣傳工作,這才是響應這兩個會議的号召的實際行動表現。(本刊編輯部)

教育部发布推行簡化漢字的通知和推廣普通話的指示

為了貫徹執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的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在11月裏向全國教育行政部門先後發出關於在各級學校推行簡化漢字的通知和關於在中、小學和各級師範學校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指示。

通知規定:全國中、小學,各級師範學校和工農業餘學校的教學,學生作業和日常書寫布告函件等,必須使用簡化漢字。原有用繁體字印刷的課本,除了在閱讀的時候仍可教繁體字以外,書寫不再要求用繁體字。通知還規定: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各級學校的公文、函件、出版物、印刷物等應該逐步地使用簡化漢字,逐步地橫排橫寫。學生的作業本、試卷等也應該儘量橫排橫寫。

指示首先說明在漢民族中間大力推廣普通話已經成為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迫切任務。在學校裏用普通話教學,會起提高教學質量的積極作用。學生學會普通話,畢業以後從事各項工作,就更便於交際,更便於發揮自己的才能。

指示規定在學校裏用普通話教學的步驟:先從語文科做起,逐漸地,可是應該儘早地推廣到其他各科。

指示提出了教學普通話的要求:中、小學和各級師範學校的學生都應該學會拼音字母(暫用注音字母),準確地發音、拼音和朗讀;課外活動,如唱歌、朗誦、演講、說故事、演話劇等,應該儘量使用普通話。各級師範學校學生還應該掌握基本的語音知識,用普通話試教。高等師範學校應該設置“語音基礎知識”一科。上述學校的教師應該逐步學會用普通話教學,而對語文科的、年青的和城市學校的教師,要求又比較高一些。在設有漢語課的民族學校中,漢語課也應該用普通話教學。

指示規定了訓練普通話師資的具體辦法。中學和師範學校的語文教師由省、市廳、局開辦北京語音訓練班進行訓練,小學的語文教師由縣和市區教育行政部門訓練。上述學校其他各科的教師和高等師範學校的

教師都由各校組織自學。為了給縣和市區的小學語文教師北京語音訓練班培養講師,省、市廳、局還應該開辦北京語音講師訓練班。指示對教師訓練班和講師訓練班的學習時間、期限,學習的內容和目的要求,開辦前的準備工作,教學進程中應該注意的事項以及編輯教材和參考資料等等,都作了詳細的規定。根據指示的要求,小學和初中一年級的語文教師和師範學校的語文教師必須在1956年暑假期間內訓練完畢,其他教師到1958年訓練完畢。指示強調在訓練過程中加強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說:必須用具體生動的事例,說明學習普通話跟社會主義建設的關係,跟提高教學質量的關係,以增強學員的學習信心和毅力。指示認為這是办好訓練班的關鍵。

為了幫助教師們學習普通話,為了提倡和幫助人民羣眾學習普通話,教育部打算商請中央廣播電台舉辦北京語音教學講座,定期聯播,並把講座的材料印出作為函授教材;指示並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商請文化行政部門通過文化宮、文化館(站)、俱樂部、戲院和報紙刊物等,向人民羣眾進行推廣普通話的宣傳。教育部還決定同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合辦北京語音研究班,由各地選送優秀教師和行政幹部參加學習,畢業後回原地工作。

指示責成各省、市廳、局根據“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的原則,把推廣普通話列進工作總計劃,並指定專人負責管理師資訓練和教材編輯等工作。指示指出做好推廣普通話工作的根本關鍵在於教育行政和學校的領導幹部從思想上認識這一工作的重要意義。因此,要求省、市廳、局領導同志首先學好《人民日報》上的《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而努力》的社論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的有關文件,組織報告會,帶動學校的教師和行政幹部,共同為完成這一迫切任務而努力。(本刊編輯部)



評王了一《中國語法綱要》

(1954年,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俄譯本,全書共263頁)•

苏联 雅洪托夫

現代中國語言學家王了一(王力)的《中國語法綱要》一書的翻譯,對蘇聯的讀者引起了很大的興趣。中國學者在本民族語言的研究領域內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們的語法理論在許多地方都是創見,常常跟西歐的和俄國的語言學界的一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中國語言學家在漢語語法的個別問題上的見解,無疑地對蘇聯漢學界起了一定的影響;中國古典語文學的某些語法術語(如“實詞”和“虛詞”,也就是有意義的詞和輔助詞)就為許多普通語言學的著作所採用。可是,王了一教授的著作的譯本還是用俄語翻譯的第一部書。這部書用中國學者的觀點給予漢語語法的一切基本問題以比較完備的概念。

王了一教授這部書是為了那些已經懂得作為本族語言的漢語,但是還不懂得漢語的理論研究的初學者而編寫的。作者在書中所包括的,主要是他自己認為無可爭論的和最重要的一些原理。必須指出,王了一教授的語法觀點的本質的特點有很多也就是其他大多數中國語言學家的特點。

王了一教授在敘述漢語語法時,最重要的特點可以說是沒有把形態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科學部門。在大多數中國語言學家的著作中都缺乏形態學,其原因大概是由於他們常常不把構詞法列入語法之中^①,而又把語法範疇的標誌看做輔助詞或小品詞,以為它們能和它們所構形的實詞分離開來,因而不進入某詞的結構中,至少它們不算詞的特徵,而算是句子成分的特徵。例如“的”這個詞素,王了一教授看作是修飾語的記號(《中國語法綱要》俄譯本,34頁),體(情貌)的語法範疇的記號——“了”和“着”——他認為不是動詞的形態,而是動詞謂語(即敘述詞——譯者)的記號(109頁)等等。由此可見,在《中國語法綱要》裏,造句法佔了主要的地位。

至於詞類,王了一教授也是認為漢語的詞類跟形態學沒有什麼聯繫,他認為漢語詞的分類“差不多完全只能憑着意義來分”(45頁)。當然,王了一也談及作為各種詞類記號的輔助詞的形態(47頁),但是,顯然地他對它們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他對於某詞歸某詞

類的歸類法和詞在句子中所負擔的職務之間的關係却說得比較詳細些(48—51頁)。

王了一教授主張詞類和漢語的簡單句的分類是有聯系的。王了一教授把簡單句分為三種類型:敘述句、描寫句和判斷句。在這三類中的第一類句子的謂語通常用動詞來表示,第二類——用形容詞,第三類——用名詞。

但是在句子類型和詞類之間的對應關係並不是到處都找得出來的。特別是在敘述句(動詞謂語)和描寫句(用形容詞表示謂語的)之間存在着許多過渡的情形。王了一教授指出敘述句的兩個語法特徵:這類句子的謂語可以有目的語,並且可以藉助於情貌的語法記號來構成。描寫句具有經常的性質,或者至少在很長的時期存在着這種性質;如果用形容詞來表示的謂語加上情貌的記號,它也就不再表示這種經常的性質而變為敘述句的謂語了。另一方面,如果動詞帶有一種形態,使它具有被動意義因而喪失了它的帶目的語的能力,那麼,它就是用如描寫句的謂語了^②。總之,形容詞在一定的形式結構中或在一定的詞組中可以用

* 本書的譯者是Г.Н. 賴斯該(Райской)。校訂者是А.А. 龍果夫和周松元(譯音)。А.А. 龍果夫和Л.Л. 巴思德涅耶娃(Позднеева)作序。書後的附註也是龍果夫作的。王了一這部書中國初版是在1946年。譯本是从第四版(王了一:《中國語法綱要》,北京,1951)譯出的。

① 譬如,呂叔湘和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把構詞法的知識列入在詞彙一章裏;請參看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37—38頁,1954,北京。在王了一的《中國語法綱要》裏沒有涉及到詞彙的問題,構詞法被放在闡明統一的漢語的語言基礎——字、詞和仿語一章裏來討論。

② 在我們所評論的這部著作的136頁上說到這個問題時,列舉的一些形態,常常給予動詞以被動的意義,像“可”、“好”、“够”等等。其他例如“得”和“不得”不一定使動詞失去帶有目的語的能力;比方,王了一教授在177頁上(根據其他的理由)引用的例子:“我——是一受不得——這樣一磨折一的。”在這句子中的動詞“受”跟“不得”本身結合得很緊,同時還有目的語。但是無論如何,當動詞跟在136頁上所列舉的詞素組合的時候,不管它有沒有目的語,不可能附着情貌的記號,因此,用這樣的動詞作為謂語性質的句子是沒有敘述句的特徵之一的。

如動詞性的謂語，反過來說，動詞也可以用如形容性的謂語。

在敘述句和描寫句之間還存在一種過渡的情形，這種情形在王了一教授的書裏沒有談到。這就是一種用所謂非動作的動詞（如“記得”、“信”、“怕”、“喜歡”、“像”及其他）做謂語的句子。這些動詞可以有目的語，但從來沒有加上過情貌的記號，並且它們還表示着人類的經常的或長期的特性。

判斷句跟其他兩類句型的界限是比較清楚的，因為名詞只有在判斷句裏可以用做謂語^①。所以，嚴格的說，在漢語裏不應分出三類句型，而只能分出兩類基本的句型——名句（用名詞做謂語的）和動句（謂語是用動詞或形容詞做的）^②。這樣是比較正確的。在這種情況下，敘述句和描寫句只是動句的兩個小類，在這兩個小類之間是被一系列的過渡情形聯繫着的。

不論是敘述句或者描寫句都可以（至少在形式上）變成判斷句；因此，給句子的謂語連接一個詞素“的”字，並在謂語的前面添上個繫詞，這就把它們變成名詞了（146—147頁）。它們二者同樣地可能具有這種包含一個繫詞和一個詞素“的”的結構，這就使敘述句和描寫句更接近起來，並使它們二者和判斷句對立起來。

談到王了一教授關於簡單句的分類的問題，還應該對於情貌範疇說幾句話。在王了一的巨著《中國語法理論》^③裏列出存在漢語裏的七種情貌（關於這個問題，參看《中國語法綱要》245頁附註14）；但是在我們所評論的這部書裏，他只研討了其中三種情貌——完成貌，進行貌和近過去貌。選上這三種情貌來談，顯然不是偶然的。問題在這三種情貌的記號——詞素“了”，“着”和詞組“來着”——實際上不僅表示情貌，而且表示時間（可是，在這部著作裏沒有提到的情貌記號却是真正具有純粹的情貌意義的）：“了”和“來着”表示過去時，而“着”字表示現在時（包括相對的現在時在內，也就是說，動作發生的時間不是從說話的時刻開始，而是從句子中所指出的任何其他的時刻開始的）。的確，王了一教授引証了一系列的用“了”字的例子，在那些例子中，意思指的是期待將來的某些行為。但是只有在“了”字用於副句的謂語（當“了”字表明在一個動作發生之前的另一個動作的時候）或者整個句子具有一定的語氣的情況下，才是可能的；除了這些特殊的條件，“了”字終究還是表示過去時的。由此可見，王了一教授在這部書裏當作是情貌記號的那些詞素，應該更正地認為是時範疇的混合的記號。

王了一教授很有趣地發展了複合句的論理。王了一分別出兩種情形：

1. 句子裏包含有句子形式，這種句子形式整個地只用作這個句子的成分之一，例如：“我們不知道張先生來。”“張先生來”——這個句子形式可以被使用來作獨立的句子；但在本例子裏的，它只是另一個句子的一部分，執行句子成分中的目的語的職務。句子中的另外一部分——“我們不知道”——不可以單獨的被使用作為完整的說話，因為其中缺少目的語。這種包含有句子形式的句子在這部著作裏，叫做“包孕句”。在王了一教授本人的其他的著作裏把這樣的句子看作是簡單句。

2. 句子是由兩個帶有句子形式組成的，這兩個句子形式不作為另外一個句子的組成部分，也不執行句子成分的職務，而是它們之間藉助於連詞來連系着或者由於它們之間缺乏停頓，例如：“你死了，我作和尚”。這個句子中的任何一部分（用逗號分開的）都可以被使用來作為獨立的句子。只有這第二類情形，王了一才認為是複合句。

“包孕句”相當於俄語的帶有附屬定語、附屬補語、附屬主語等等的主從複合句。這些用如句子中某一成分的句子形式，王了一教授根據它們通常在句子成分中起着一個單詞的作用的原則給它們分了類。

王了一教授把真正的複合句分為等立複合句（171頁），以及帶有時間、條件、容許、理由（用“既”或“既然”連接的）、原因、目的和結果等附屬句的主從複合句（177頁）^④。作者只列舉了這幾種主從句，沒有給予它們以任何的分類。其實這樣的分類（根據語法的，而不僅僅根據意義的標準）是可能的。首先，帶有目的附屬句和結果附屬句的句子就不同於帶有其餘的附屬句的句子，在這兩種句子裏，“主要的”部分放在“從屬的”部分前面（也就是：主要句——附屬句），而沒有相反的情形（參看183頁，185頁），同時，在這兩種句子中，它們的連詞在語源上本是動詞或形容詞。其餘的主從句，都是從屬的部分在前面；按照它們的主要部分的形式來區分，同樣地可以分為兩類。帶有時間、條件、理由

①在109頁上，王了一教授談到某些名詞可以加上情貌的記號，利用來作為敘述句的謂語。當然，像在110頁上所舉的例①就是這種情形。但是在这个例子裏，用做謂語的“奶”字是一個動詞（“喂奶”），而不是名詞了；它始終是動詞，並沒有特別的形態，但是和它相對應的名詞“奶子”就帶有名詞詞尾“子”在後面。

②詳情請參看A. A. 龍果夫著《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第一章詞類，92頁，1952年，莫斯科外文出版局。

③參看王力，《中國語法理論》，1951年，上海，第2版，上冊，283—284頁。

④我們在這兒採用了蘇聯語言學界公認的術語。王了一教授本人沒有關於“附屬句”和“主要句”的術語；作者有時候只說到複合句的從屬的和主要的部分。

和原因等附屬句的句子組成一類，這些句子的主要部分可以包含連詞“就”、“便”或者“才”（按其來源都是副詞）。帶有容許附屬句的主從句是屬於另一類，在這種句子的主要部分裏任何時候都不用“就”、“便”和“才”，但可以使用連詞“也”（也是來源於副詞）和一些其他的詞①。

王了一教授使另外兩種語法結構跟包孕句接近起來。這兩種語法結構就是：包含謂語形式的句子和“遞繫句”。

謂語形式也像句子形式一樣，它一進入句子裏，總是成為句子的成分。動詞是謂語形式的主要的詞，動詞後面可以有目的語或狀語，但沒有自己的主語，例如：“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156頁）。“贖我”是謂語形式。它不構成句子形式，因為動詞“贖”沒有主語；把它翻譯成俄語相當於動詞的不定式。可是“贖”這個詞本身在漢語的例子裏不是不定式；它也有形態（零形態），那就是它在謂語作用中所有的形態。

但是王了一教授在這部書裏所引用的謂語形式的例子（156—158頁）和他在其他的著作裏所引用的（關於這些例子，參看254—256頁，附註3和附註5）是不一致的。試比較下列兩組例子②：

1. 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人物；
襲人招手叫他。
2. 贖我的念頭。
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在這些例子裏的動詞“尋找”、“招”、“贖”、“走”（跟從屬於它們的詞一起）就是謂語形式，因為它們都沒有自己的主語。但是在第一組例子裏的謂語形式（有動詞“尋找”和“招”的）表示被修飾的行為者的動作，這個行為者在句子裏也是指明了的（相當的——“人物”和“襲人”）。同時，在這兩個例子裏的動作和行為者之間的關係從句子的結構上也可以看出來，也就是說，它在語法關係上很顯明，而不必按意義來推測：作為名詞的修飾語的謂語形式（第一組的第一例），表明了这个名詞所指的人物的動作；而修飾句子中的真正謂語的謂語形式（同一組的第二例）也是屬於行為者的，它對主語所指的人物來說也可以作為自己的謂語。相反的，第二組例子裏的謂語形式所表明的動作是抽象的，它無論如何不屬於被修飾的行為者，甚至連行為者也不可能推測出來；如果要推測出來，只能根據上下文，而不可能按照句子的結構。

在第一組和第二組的例子之間還有一個區別。第一組的謂語形式所包含的動詞可以加上輔助詞素“了”和“着”，並作為真正的動詞謂語。在謂語形式裏使用“了”和“着”作為謂語的修飾語的例子，在158頁上引

用過；在作為名詞的修飾語的謂語形式裏的動詞的形態雖然比較少見，但它還是完全可能的。在第二組謂語形式裏的動詞不可能加上詞素“了”和“着”（但是，附帶說一句，它們可能形成純粹的情貌，而沒有體·時的意義）。

謂語形式如果與行為者發生聯繫並且容許有動詞謂語經常所特有的形態，它在句子裏也就只能用做修飾語——名詞的修飾語或謂語的修飾語（也就是狀語）。謂語形式如果抽象地表示行為，它就往往被用於這樣的一些職務，即句子形式所有一樣的職務。特別是這兩種結構都不能用做謂語的修飾語（狀語）。

“遞繫句”，王了一教授也使它跟“包孕句”接近起來；它是由兩個句子形式組成的，並且組成第一個結構的一部分的某些詞，同時是第二個結構的主語。這種遞繫句，王了一教授用這樣一個例子來說明：“你—叫—他—來”（164頁）。在這個句子裏，它發生了兩次謂語聯繫：“你—叫—他”和“他—來”；“他”字既是這種結構的前一部分的目的語，同時又是後一部分的主語。

在“遞繫句”的名義下面，王了一教授歸納了幾個相當不同的結構，並且給它們加以說明：在許多情況下都是令人懷疑的。譬如說，認為上面引用的例子（你—叫—他—來）是包含兩次謂語聯繫，這就未必正確。這個例子可以改變為處置式：“你—把—他—叫—來”。這兒的“他”字被提在前面，並且提在動詞“叫”的前面；它也沒有直接地處在“來”字的鄰近。這就證明了“他”字是“叫”字的直接目的語，並跟“來”字沒有語法上的關係；實際上後者在這個例子裏沒有什麼實詞的意義，而只有輔助的意義（“來”字的輔助意義在指出前面的動詞所表示的動作——在我們的例子裏用動詞“叫”——趨向於說話者方面：“叫他到這裏來”）。因此，“來”字不能形成第二個謂語聯繫。還有《中國語法綱要》裏，第二類例子裏的“做”（165—166頁），第四類例子裏的“有”（“沒有”“無”）（167頁）以及第二大類（“表語為主語”——譯者）例子裏的“誰”（167—168頁）也都只是一種輔助詞。

王了一教授在描述漢語語法結構的特徵時，常常指出漢語語法構造在很大的程度上不同於歐洲諸語言的語法構造。在這一點上，他強調指出，各種語言在它們的語法構造方面的這種差別，不管在任何情形下，不應該被解釋為一種語言優越於另一種語言的證據。

①除了帶有容許附屬句的句子外，還有一些在《中國語法綱要》裏沒有談到的其他類型的主從複合句，在這類句子的主要部分裏也不可以用連詞“就”、“便”和“才”來修飾。這些句子可以歸在帶有容許附屬句的一類裏。

②所有的例子（除最後一個外）都是引用省略的形式。

……無論古今中外，任何民族，語法總是够用的；当甲种方式缺乏的時候，就有乙种方式來補償。若固执某一种方式而說……甲族語勝於乙族語，都是一偏之見”（75頁）。

《中國語法綱要》当然还不是完备的漢語語法。許多重要的問題在這本書裏只是順便的觸及一下。A.A. 龍果夫編寫的附註，对願意獲得更詳盡的關於某一語法現象的知識的讀者，可以給予很大的幫助。凡關於王

教授書中有疑問的或者闡述得不够透澈的問題，附註裏都指出了中文的參考資料和俄文的參考資料。王了一教授的著作除了描述漢語語法的構造以外，还包括有（在頭兩章中）關於漢語的語音和漢字的基本知識。

《中國語法綱要》的俄譯本毫無疑義地將幫助苏联的東方學家和語言學家更深刻地通曉偉大的漢民族語言。（唐作藩譯自苏联科学院出版的《語言學問題》1955年第3期）

《中國語文叢書》簡介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輯的《中國語文叢書》，从1954年1月開始出版，到現在已經出了八本。現在按照出版先後，簡要地介紹一下：

《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

這本書是从1952年起至1953年上半年止一年半間有關文字改革的方針和情況的重要文章的彙集。

關於這本書，《中國語文》29期有較詳細的介紹。

《中國文字改革問題》

編輯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把六十年來中國文字改革的實踐經驗和關於文字改革問題的學術研究加以初步整理，供有心和從事文字改革工作者的參考，引起大家繼續展開討論。

這本書1952年7月原由新建設雜誌社出版。在編入《中國語文叢書》再版以前，曾經各原作者修訂。《中國語文》創刊上有專文介紹。

《論漢語》

這是一本翻譯的書，原作者是苏联漢學家康拉德教授。本書的特點是它的馬克思主義的戰鬥性。作者根據斯大林語言學說，無情地批判了馬爾、特別是西歐資產階級語言學對於漢語的錯誤觀點，他們認為漢語是原始的、落後的語言，是單音節的、詞彙貧乏的、沒有形態的語言。

作者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觀點，分析了現代中國的具體歷史情況，無可辯駁地証明了漢語已經作為民族語言而發展着。作者進一步對中國幾十年來所見的語言實際情況、漢族共同語和方言的情況作了具體的分析，正確地指出：方言地方性質，它們的出現，不是意味着共同的統一語言的分化，而只是它的複雜化。而官話、普通話、白話和國語——這一切標誌着漢族全民語言發展的同一直線。作者比較詳盡地討論了漢語詞彙的音節結構和它的形態學問題，得出了與西歐資產階級漢語學者們完全不同的結論：“現代漢語，漢民族是以它的無比豐富的詞彙著稱的。”“這種詞彙是由形態學形成的詞構成的，而形成詞的方法是多样性的。”“漢語的詞法構造有它自己的精確法則。”“這種非常發達的詞彙和語法構造使漢語能夠表達出達到文化最高階段的人的任何意思。”

《拼音文字和漢字的比較》

本書的作者們根據實際材料，從應用文字的各個專業範圍——打字、印刷、電報、速記、檢字、翻譯和寫口語等方面——比較了拼音文字跟漢字的效能；介紹了閩南應用拼音“白話字”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採用拼音文字的經驗。作者們指出拼音文字的優越和方塊漢字的無可避免的缺陷，得

出了中國文字必須走向拼音化的正確結論。

《漢字的整理和簡化》

整理並簡化漢字是文字改革的第一步工作。這本書裏丁西林、葉恭綽和魏建功的文章，分別說明了這個工作的主要內容和它的重要性以及簡體字在文字史上的地位。

這本書的作者們比較詳細地研討了有關整理、簡化漢字的各種問題和方法——刪除異體字，採用簡筆字，在一定範圍內簡化、合併偏旁部首，在採取多音詞連寫辦法的條件下省去形旁和用同音代替以及參用拼音字等等。作者們提出了對這些問題的自己的意見。對於濫造複音字和新形聲字的錯誤傾向，書中也有所批判。

這本書還收集了評介教育部公布的《常用字表》的兩篇文章。

《國內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概況》

這篇文章按其內容分為以下三類：一、少數民族語文工作者對發展少數民族語文這一工作的一般性的意見；二、有關少數民族語文情況的介紹；三、少數民族語文工作者的工作情況的報道。

《漢語的詞兒和拼寫法》（第一集）

將來漢語拼音文字的書寫方式，一般地說，詞和詞之間應該分開，一個詞的諸音節應該連寫，這是文字改革工作者們所同意的。不過，有不少的具體問題，大家意見還不一致，譬如：“什麼叫詞兒”，“詞同字的區別”，“詞同短語的區別”，“詞同連寫的關係怎樣”，“憑什麼標準來連寫”，等等。這些問題還牽涉到對漢語的性質的認識，即漢語是不是單音節語的問題。這本書對這些問題作了討論。作者們有的提供了關於文字改革工作者過去處理這些問題的一些資料，有的根據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一些具體的連寫辦法。

《漢語的詞類問題》

這本書討論了兩個問題：一、漢語的詞能不能分類；二、漢語的詞應當根據什麼分類。

通過高名凱教授的《關於漢語的詞類分別》一文，大多數作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見。這一討論的深入，對漢語詞類問題的研究無疑是邁進了一步。這本書收集參加這一討論的文章共15篇，這些文章曾經先後在《中國語文》和《語文學習》从1952年起至1954年10月為止的各期上發表。

這個叢書由中華書局出版，新華書店經售。

（本刊編輯部）

《中國語文》第37期到第42期篇目索引

(1955年7月号到1955年12月号)

| | 期數(月份) | 頁數 |
|---|------------------|----|
|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決議 | 41 (11) | 33 |
| 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決議 | 42 (12) | 24 |
| 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而 努力 | 《人民日報》社論 41 (11) | 4 |
| 擁護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的決議，大力宣傳 文字改革的方針和步驟，積極推行簡化字和以 北京話為標準的普通話 | 章 慤 40 (10) | 3 |
| 內蒙古自治區的一個重要決定 | 章 慤 39 (9) | 3 |
| 內蒙古自治區人民委員會關於推行新蒙文的決定 | 39 (9) | 4 |
| 提高我們的政治警惕性徹底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 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 章 慤 37 (7) | 3 |
| 為完成和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奮鬥 | 章 慤 38 (8) | 3 |

評 論

| | | |
|----------------------|--------------|----|
| 布拉格學派(批判特魯別茨科依的音位學說) | 謝爾久琴柯 38 (8) | 23 |
| 略論葉斯丕森學說對漢語語法研究的影響 | 嚴 修 40 (10) | 16 |
| 批判胡適反動的語言學觀點 | 殷德厚 38 (8) | 12 |

文字改革問題

| | | |
|------------------------------------|-------------------------|----|
| 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 | 吳玉章 41 (11) | 7 |
| 為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鋪平道路 | 郭沫若 41 (11) | 11 |
| 關於中國文字的幾個問題 | 謝爾久琴柯 41 (11) | 19 |
| 漢字改革和電報業務 | 朱學範 41 (11) | 15 |
| 文字改革和電報業務 | 朱學範 37 (7) | 26 |
| 關於解決拼音電報中的同音字問題 | 張 雁 37 (7) | 32 |
| 電碼改革問題的研討 | 王蔭禮、馬玉崑 38 (8) | 26 |
| 東北鐵路電報改革工作的經驗總結 | 鐵道部電務局 37 (7) | 30 |
| 對文字改革提三點建議 | 陳望道 41 (11) | 14 |
| 拼音文字中的聲調問題 | 周有光 37 (7) | 4 |
| 試論尖團音的分合 | 李 濤 37 (7) | 10 |
| 拼音漢字中的聲調問題 | 傅懋勳 39 (9) | 18 |
| 漢語拼音文字上的聲調問題 | 江 成 40 (10) | 7 |
| 談談聲調問題 | 喻世長 38 (8) | 10 |
| 漢語拼音文字是否需要標調的問題 | 胡震元、婁其四、鄭俊文、黃智顯 40 (10) | 40 |
| 漢語拼音文字怎樣處理聲調問題(北京語言學界 第三次座談會記要) | 37 (7) | 40 |

| | | |
|---------------------------------|-------------|----|
| 從巴甫洛夫學說看漢字改革的必要 | 戈紹龍 40 (10) | 10 |
| 不應當歪曲拉丁化新文字運動 | 任言信 37 (7) | 13 |
|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概況 | 陳 越 41 (11) | 34 |
|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在北京舉辦中國文字改革 文獻資料展覽會 | 倪海曙 40 (10) | 34 |

漢字整理問題

| | | |
|---------------------|-----------------|----|
|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優越性 | 丁勉哉 38 (8) | 32 |
| 對《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幾點意見 | 鮑幼文 38 (8) | 39 |
| 關於《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名稱及其他 | 朱廣福 40 (10) | 42 |
| “系統整理”和“約定俗成” | 邱常恕 39 (9) | 40 |
| 400個異體字留廢規律的研究 | 金鳴盛 39 (9) | 39 |
| 反對亂造新字 | 范 同 39 (9) | 31 |
| 贅疣字和生僻字 | 袁 明 40 (10) | 39 |
| 建議簡化三個虛字 | 陳大愚 38 (8) | 40 |
| 略談漢字在日本的整理和簡化 | 劉澤先 39 (9) | 30 |
| 我們擁護“漢字簡化” | 許錫丰 38 (8) | 41 |
| 對楊真先生提一些意見 | 荆兆鴻、梁君瑞 40 (10) | 43 |
| 談談科學用字的同音代替 | 劉澤先 37 (7) | 33 |
| 關於同音代替方法的商討 | 唐伯先 39 (9) | 42 |
| 運用同音代替方法，擴大精簡範圍 | 王士襄 39 (9) | 43 |
| 談《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中的同音代替問題 | 徐世松 39 (9) | 41 |

| | | |
|-----------------|-------------|----|
| 漢字簡化方案應該體現拼音化方向 | 張少懷 40 (10) | 41 |
| 文字改革工作中的鉛字改革問題 | 陳 越 38 (8) | 28 |
| 橫行排寫上標點符號的運用問題 | 陳 越 40 (10) | 28 |
| 希望橫排報刊統一書名號 | 倫海濱 40 (10) | 29 |

語 法

| | | |
|------------------------------|--------------|----|
| 關於漢語有沒有詞類的討論 | 本刊編輯部 37 (7) | 20 |
| 對許紹早的批評的答辯 | 傅子東 37 (7) | 22 |
| 修飾語和名詞之間的“的”字的研究 | 陳瓊瓚 40 (10) | 22 |
| 現代東干語的計算詞、計算詞尾和數量單位的語 法特徵 | 彭楚南譯 40 (10) | 37 |
| 談“的”字的分化 | 李子木 38 (8) | 22 |
| 對《語法修辭講話》的幾點商榷 | 王松茂 40 (10) | 20 |
|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六) 蘇聯 A. A. 龍果夫 | 37 (7) | 36 |
|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七) 蘇聯 A. A. 龍果夫 | 38 (8) | 34 |
|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八) 蘇聯 A. A. 龍果夫 | 39 (9) | 34 |
|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九) 蘇聯 A. A. 龍果夫 | 40 (10) | 30 |

漢語問題

期數(月份)頁數

| | | | | |
|--|---------|----|------|----|
| 略論漢語規範化 | 羅常培 | 40 | (10) | 5 |
| 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 | 張奚若 | 42 | (12) | 9 |
| 現代漢語規範問題 | 羅常培、呂叔湘 | 42 | (12) | 3 |
| 曲藝工作者應該怎樣進行推廣語言規範的工作 | 吳曉鈴 | 42 | (12) | 14 |
| 從漢語的發展過程說到漢語規範化 | 黎錦熙 | 39 | (9) | 6 |
| 關於漢語規範化問題 | 林 蕪 | 38 | (8) | 4 |
| 教科書裏的語言的規範問題 | 蔣仲仁 | 41 | (11) | 16 |
| 談南方人學習北京聲調的問題 | 江 成 | 37 | (7) | 7 |
| 教學北京音的點滴經驗 | 徐世榮 | 42 | (12) | 16 |
| 近幾年來蘇聯東方學研究中的漢語形態問題 | 郭路特 | 42 | (12) | 30 |
| 對於漢語規範化的意見 | 丁 是 | 38 | (8) | 39 |
| 我對語言規範化的意見 | 浩 浩 | 40 | (10) | 19 |
| 為了語音的規範化，必須糾正隨便類推的現象 | 余生蓉 | 40 | (10) | 9 |
| 在語言科學的研究中體現了深厚的兄弟般的友誼 (記兄弟國家語言學者最近在我國的學術活動) | 何 立 | 42 | (12) | 35 |
|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即將召開現代漢語規範問題 學術會議 | | 37 | (7) | 35 |
|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召開漢語規範化問題座談會 | | 37 | (7) | 42 |
| 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紀要 | 羣 策 | 41 | (11) | 36 |
| 漢語規範化對兄弟民族學習漢語的重要意義 | 吳 昌 | 42 | (12) | 21 |
| 電影、話劇演員們要擔起漢語規範化工作中 的責任 | 吳 青 | 42 | (12) | 22 |
| 翻譯工作中的漢語規範化問題 | 董秋斯 | 42 | (12) | 26 |
| 關於詞典的選詞工作 | 孫崇義 | 42 | (12) | 28 |
| 對漢字改革和漢語規範化的反映(讀者來件綜述) | 本刊編輯部 | 42 | (12) | 39 |
| 教育部發布推行簡化漢字的通知和推廣 普通話的指示 | 本刊編輯部 | 42 | (12) | 41 |
| 《語文學習》和本刊聯合招待各地語文工 作者舉行座談 | 本刊編輯部 | 42 | (12) | 29 |
| 語 言 學 | | | | |
| 關於文學語言規範化的幾個問題 | 鄂山蔭 | 41 | (11) | 26 |
| 關於單一的民族語言 | 格拉烏爾 | 41 | (11) | 30 |

少數民族語言

期數(月份)頁數

| | | | | |
|------------------------|-------|----|------|----|
| 如何幫助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幹部學習民族語言 | 馬學良 | 39 | (9) | 26 |
| 僮族文字同僮語的基礎方言和標準音問題 | 謝爾久琴柯 | 37 | (7) | 15 |
| 論現代烏孜別克標準語的方言基礎 | 王均譯 | 40 | (10) | 35 |
| 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在北京勝利召開 | 本刊編輯部 | 42 | (12) | 27 |

詞 彙

| | | | | |
|----------------|---------|----|-----|----|
| “打仗”、“打架”是不是詞? | 鍾本康、鍾 棧 | 38 | (8) | 41 |
| 略語是不是詞兒? | 鄒國統、呂叔湘 | 38 | (8) | 43 |
| “以上”和“以下”的含義問題 | 鄒定中 | 39 | (9) | 5 |

語文書刊評介

| | | | | |
|--------------|-------|----|------|----|
| 評王了一《中國語法綱要》 | 雅洪托夫 | 42 | (12) | 42 |
| 《中國語文叢書》簡介 | 本刊編輯部 | 42 | (12) | 45 |

圖 片

| | | | |
|-----------------|----|------|----|
|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情況 | 41 | (11) | 封二 |
| 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開幕式 | 41 | (11) | 封三 |

11月號勘誤表

| 頁 | 欄 | 行 | 誤 | 正 |
|----|---|-------|----------------|-----------------|
| 24 | 右 | 3 | 不得不“憑空一個一個的記住， | 不得不“要憑空一個一個的記住。 |
| 24 | 右 | 11—12 | 應該感謝的，但在形成了... | 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 |
| 24 | 右 | 17 | 為特權者所攬 | 為特權者所收攬 |
| 24 | 右 | 24 | 人們多 | 人們一多 |
| 24 | 右 | 26—27 | 加上條高門檻 | 加上一條高門檻 |
| 24 | 右 | 注解第4行 | 39—94頁 | 93—94頁 |
| 25 | 左 | 5 | 大概佔全人口 | 大概只佔全人口 |
| 25 | 右 | 3 | 寫起來要混雜 | 寫起來會混雜 |
| 25 | 右 | 注解第3行 | 6卷，116頁。 | 6卷，117頁。 |
| 13 | 左 | 倒17 | 製訂的字母為基礎的 | 製訂的以字母為基礎的 |

雜誌創刊預告

心理學譯報(雙月刊)

為了學習蘇聯心理科學的先進理論和經驗，介紹蘇聯心理學實驗和研究成果，建設祖國的心理科學，使心理科學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中國心理學會決定創刊“心理學譯報”。“心理學譯報”的主要內容是選譯蘇聯“心理學問題”雜誌上所刊登的論文，並選登蘇聯“哲學問題”、“蘇維埃教育學”、“俄羅斯教育科學院通報”中刊載的心理學論文。

“心理學譯報”是雙月刊，逢雙月出版，1956年2月起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郵局總發行。“心理學譯報”將成為心理科學工作者的必要讀物，同時也將成為教育工作者、生理科學工作者、醫務工作者、保健工作者、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有益的參考資料。

創刊號1956年2月24日出版

16開本 40面 定價0.35元

教育譯報(雙月刊)

新中國成立以來，蘇聯的教育書籍已經翻譯出版了不少，對於全國教育工作者學習先進的教育理論和經驗，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及時介紹蘇聯教育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方面，過去只在少數報刊上零星發表一些譯文，遠不能滿足廣大教育工作者的需要。現在為了及時介紹蘇聯教育科學論著和教師的先進經驗，從1956年1月起創刊“教育譯報”，以後逢單月出版。

“教育譯報”從蘇聯出版的“蘇維埃教育學”、“人民教育”、“初等學校”、“教師報”、“家庭與學校”以及有關中小學各科教學的專刊上，選譯跟我國教育工作有密切關係的材料。每期的全部或大部分譯文都圍繞着一個中心問題，使讀者能對它有一個比較系統而全面的了解。

創刊號1956年1月27日出版

16開本 40面 定價0.35元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郵局總發行

北京市期刊登記證出期字第022號
經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認為定期出版物

每冊定價人民幣0.20元
(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中國語文

月刊

1955年12月号

第42期

1955年12月22日出版

社長 章 愷

編輯委員

丁西林

杜松壽

林漢達

倪海曙

曹伯韓

葉恭綽

鄭之東

王 力

吳曉鈴

陳 剛

章 愷

莊 棟

葉聖陶

黎錦熙

呂叔湘

羅常培

高名凱

陸志韋

傅懋勳

葉籟士

魏建功

總編輯 林漢達

編輯者 中國語文雜誌社
北京(18)翠花胡同內太平胡同8號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東街45號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橋

總發行處 郵電部北京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電局、所

代銷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預定：三個月0.60元，半年1.20元，全年2.40元；寄費：1.平郵寄費不計，2.掛號郵費由訂戶負擔。

1-27,820